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青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81 期
2019 年 6 月 15 日

目 录

【论 文】

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

——20 世纪上半叶苏联对华外交主导思想初探

马 戎

斯大林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

——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沈志华

对“三区革命”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杨恕、李捷、曹伟

1946-1949 年苏联的新疆政策

贾米里·哈桑雷著，杨恕 编译

印度取消印地语强制教学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苑基荣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利益¹

——20 世纪上半叶苏联对华外交主导思想初探

马 戎²

摘要：在分析讨论各国外交活动时，我们需要关注两个维度。一个是国家领导集团制定的外交战略在意识形态理念方面的追求，另一个是国家领导集团对现代民族国家“国家利益”的务实追求。本文简略讨论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基本立场，以及列宁、斯大林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基本观点，并通过对 20 世纪 20-30 年代中苏关系的几个重要事件来分析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在遇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和本国实际利益相抵触时所做选择，以及相应行动造成的社会后果。

1921-1943 年期间，共产国际直接干预中共中央的人事、政纲和政策，因此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互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在研究民国时期东北、内外蒙古和新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变迁以及研究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关系演变时，苏联政府与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同样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国家利益

在对外交涉与国际竞争中，一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必须制订本国的外交战略、外交活动主要目标与政策，在此基础上制定具体行动方案与实施措施，以便将国家的宏观战略在日常外交活动中予以落实。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是各国基本国策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有时外国政权甚至会威胁到本国领土完整、政权体制和经济形势，因此面对周边邻国不断变化的外交政策、贸易环境、文化交流态势以及多种影响因素，各国政府需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对这些因素加以综合考虑，及时对本国的外交战略与实践进行调整。

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在分析判断形势、选择外交战略和应对方针时，都需要借鉴历史经验与教训，从而理解本国社会及内部不同地区社会演变的客观规律，避免重蹈外交失败和治理失误的历史覆辙。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各地区的人文、地理和发展历史各有特点，为了把握不同地区的社会发展方向，促进各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和族群良性互动，我们必须重视对历史经验的汲取。以往的历史虽然不能复制，但是各地区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民族族源与语言宗教特点、族际交往的历史记忆等都是相对稳定并有一定历史延续性的。因此，今天我们仍然需要从历史上中国政府治理各地区的具体实践中吸取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不断改进各项工作，从而为每个地区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一、分析各国外交活动时需要关注的两个维度

我们分析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设计与具体实践时，需要关注贯穿其过程的两个重要维度，并通过解读这两个维度之间的交织、替代与执行力度来捕捉其基础模式和变化规律。

其中一个维度是国家领导集团在制定其外交战略主导思想及推行其具体政策时在意识形态理念方面的追求。“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来自西方社会的概念，根据西方学者的归纳，

¹ 本文修订稿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9 年第 1 期，第 89-107 页。

²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所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大学兼职教授。



在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中先后出现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体系，而且在一定时期各国都有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一种意识形态。举例来说，希特勒德国信奉的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纳粹意识形态，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和 1949 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标榜的意识形态是“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毋庸置疑，各国领袖和执政党领导人对意识形态的虔诚程度必然会影响该国外交政策所追求的方向与执行力度。高举有鲜明特色和明确目标的意识形态旗帜，通常有助于领导集团的内部团结及引领民众在人生理想与社会伦理方面所追求的方向，占据国内外舆论的道德制高点，引导民众情感演变的倾向并激发国民凝聚力。

在对国际交往进行分析时，我们需要关注的另一个维度，就是政府领导集团在宣传和标榜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对国家整体和长远利益的务实追求，即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这里所说的“国家利益”主要指的是以现代民族国家形式展现并通常得到绝大多数国民认可和支持的“民族利益”，决不是执政党领袖或执政集团的小群体利益。同时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国家的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知和国家边界有时也处在变动之中，许多国家的民众是在殖民主义国家入侵的过程中逐渐获得“民族国家”的清晰概念，而且这一概念会因为国际风云和本国制度建设发生变化，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即是生动的例子。不必讳言，处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群体和民众对“国家”和“国家利益”的认知也存在差异，这就是现代国际政治和文化传统相互交织而呈现的复杂现实。

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假定一个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能够得到的国家实际利益包括：（1）在对外战争中获胜，得到战争赔款，迫使他国割让领土（包括人口、自然资源）等直接利益；（2）在以军事实力为后盾的外交活动中迫使他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此获取特殊权益（建立本国租界和军事基地、治外法权、控制对方海关、本国人员在该国自由旅行权等）和经济利益（贸易关税减免、无货品贸易限额、矿产勘探开采权、铁路公路修筑管理权等）；（3）获得对外国领导集团的政治影响力，缔结不平等盟约，使之在国际组织投票或国际争端中支持本国立场；（4）获得对国外精英群体及社会民众在意识形态、政治体制等方面的感召力及文化影响力等“软实力”，而软实力即是该国精英与民众支持本国外交和政治影响力的民意基础。以上这些以国家为单元所获得的“荣誉”和给本国财政和民众带来的各种“实惠”，无疑会加强本国统治集团和政权合法性和可支配经济实力，使执政集团和国家领袖成为国民普遍拥戴的“民族英雄”并载入史册。这对国家领导集团及领袖人物自然极具吸引力。

在现实的外交实践活动中，对国家实际利益的追求有可能与领导集团口头推崇的意识形态理念相互冲突，此时，政府必须在二者的利弊之间有所权衡并做出选择。所以，我们在殖民主义年代看到的实际情况是：在国内和外交辞令中始终鼓吹“自由、平等、民主、共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亚非拉广大地区实际推行的却是赤裸裸的另外一套行动，在以“通商自由”、“保护本国公民”名义而开启的对外战争中，实际行动却是抢掠烧杀、强制签订不平等条约、强占殖民地、抓捕奴隶和恢复奴隶制。而这些帝国主义者对于境外民众实施野蛮行为所做的逻辑解释，则是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双重标准”。亨廷顿对此也讲得十分坦白：“历史上，相同文明的国家或其他实体之间的关系有异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实体之间的关系。对待‘像我们’的人的指导原则与对待不同于我们的‘野蛮人’的指导原则是截然不同的。基督教国家彼此打交道的原则不同于它们与土耳其人和其他‘异教徒’打交道的原则”（亨廷顿，1999：134）。

因此，在国际事务中虽然有所谓的国际法和外交行为准则。但是帝国主义国家领袖们所信奉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国际外交法则始终是“弱肉强食”与“零和博弈”。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国家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的外交与军事活动中，所谓国际法只是字面上的幌子而已。在中国国势衰弱的那些年代，各帝国主义国家在对华关系中历来是不顾忌任何外交行为准则的，只信奉“丛林法则”。所以我们从近代世界历史走向中所看到的真实情况，恰恰是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和外交官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限制被侵略国的抵制或与其他国竞争时，才会假惺惺地标榜所谓“国际准则”，在其他情况下则是赤裸裸地巧取豪夺，全然不顾所谓“国际公法”。弱国无外交，“人为刀俎，我为鱼肉”，这就是从晚清到民国时期中国外交的真实写照。

二、马克思、恩格斯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基本立场

1917年十月革命中夺取了俄国政权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该党1918年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1925年改称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十九大”改名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十月革命后，俄国改国名为苏维埃俄国（简称苏俄），1922年正式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简称苏联）。本文主要关注的历史时期是1917-1949年，在此期间俄国是由宣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人执政，所以在对这一时期俄国具体外交活动事例进行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讨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一）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在19世纪欧洲各国内部普遍激化的社会矛盾和复杂错综的国际关系中，如何认识与看待“阶级（斗争）”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当时各国政党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一个核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这一纲领性文件中明确指出：“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是在英国或法国，也无论是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已经使无产阶级失去任何民族性了。……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477，479）。因此，作为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对于在全世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必然超越对当前自身所属“民族”（国家）利益的追求，为此共产党必须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旗帜和对外宣传的意识形态。当有些人批评共产党人是要“废除祖国、废除民族”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坦承：“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原来没有的东西。既然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主导）阶级，确立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不过这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个意思。……民族内部的阶级对抗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487-488）¹。这句话可以被解读为：现实社会中各国的工人起义和夺权斗争，只能在本国内部发起并针对本国反动政府。无产阶级在夺取本国政权后将主导所在民族（国家）的政治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在全世界消灭资产阶级统治和一切剥削制度，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的全球化，建立全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之前，任何“民族”（国家）即使是无产阶级掌权的“民族”（国家）的存在，只能是“暂时的”。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观			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观		
(德意志) 资产阶级	(英吉利) 资产阶级	(法兰西) 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 德意志民族国家	(资产阶级) 英吉利民族国家	(资产阶级) 法兰西民族国家
无产阶级 (德意志)	无产阶级 (英吉利)	无产阶级 (法兰西)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

来源：Connor, 1985:1。

图1、马克思主义民族（国家）观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观的比较

¹ 这段重要论述的英文文本为 “The working men have no country. We cannot take from them what they have not got. Since the proletariat must first of all acquire political supremacy, must rise to be the leading class of the nation, must constitute itself the nation, it is, so far, itself national, though not in the bourgeois sense of the word……In proportion as the antagonism between classes within the nation, the hostility of one nation to another will come to an end”(Tucker, 1978: 488-489).

美国学者康纳（Walker Connor）在《马列主义理论和战略中的民族问题》一书中把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民族国家观”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观”进行比较（图1）。

1. 依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阶级分野是工业化各国内部的基本社会结构，阶级斗争是现代社会最核心和最本质的社会矛盾，因此，各国社会内部的阶级界限的重要性远远超越国家间的利益冲突。在图1的左侧部分，德国、英国、法国三国的资产阶级属于同一政治阵营，三国的无产阶级属于另一政治阵营，区隔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群体界限是黑粗实线，不同国家之间的边界是虚线。而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观念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是最重要和最基础的政治与文化认同边界，所以在图1右侧，德国、英国、法国三国之间的界限是黑粗实线，而各国内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边界是虚线，表示“民族”和“民族国家”是各国国民（无论属于哪个阶级）共享的最核心、最本质的认同单元和效忠对象。左边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国家观，右边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国家观，两者基本立场针锋相对。康纳的说明和图示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中有关“民族（国家）”论述的注脚。

2. 现代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追求的是建立“民族国家”并极力捍卫和扩张民族国家的国家利益（state interest of nation states）。这是另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则包括与其他国家进行战争争夺殖民地、武力开展海外殖民扩张和掠夺资源、通过战争手段强迫其他国家签订有利于本国的不平等条约、炫耀军力来追求地区乃至全球霸权，等等。这样的“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帝国主义，在对外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帝国主义行为即是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外在表现。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在国内实行的社会福利制度，则起到了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和消弭国内阶级斗争的作用，这种制度实际上凸显出各国国民的整体利益，加强了民族主义的号召力。由于这种意识形态超越了历史上的传统群体认同（以种族、祖先血缘、宗教、语言习俗等作为区分群体的标准），所以即使在白人基督教国家之间，仍会发生彼此因争夺领土和殖民地所爆发的追求帝国主义国家利益的残酷战争。

3. 马克思指出，在欧洲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统治、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政治运动中，任何“民族主义”的宣传都必然成为分化和破坏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手段，因此任何“民族领袖”也必然是伪善和反动的政治人物。“阶级的统治已经不能拿民族的外衣来掩盖了”（马克思，1871b：383）。“各国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世界市场上互相冲突竞争，但总是联合起来反对各国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409）。马克思尖锐地指出，“民族主义”在基本性质上已经彻底沦为反动派维护其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旧社会中身居高位的人物和统治阶级**只有靠民族斗争和民族矛盾**才能继续执掌政权和剥削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群众”（马克思，1871a：316）。“自古以来，一切统治者及其外交家玩弄手腕和进行活动的目的可以归结为一点：为了延长专制政权的寿命，**唆使各民族互相残杀**，利用一个民族压迫另一个民族”（恩格斯，1848：177）。马克思多次呼吁，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必须针锋相对地、坚决地揭穿资产阶级编织的虚妄“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的神话。在无产阶级运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民族”和“民族主义运动”已经沦为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思想武器和统治工具，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应当以各民族的工人兄弟联盟来对抗各民族的资产阶级兄弟联盟**”（马克思和恩格斯，1847：412），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而且，也只有把分散在各国的工人阶级队伍组织和团结起来，无产阶级才有可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并取得革命的胜利。

4. 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各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的基本政治立场。所以，在一个国家掌握了统治权力的共产党人，必须站在国际主义立场无条件地支持其他国家工人和劳动民众的政治斗争，而不能像资产阶级政府那样维护甚至追求本国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以民族国家的名义在政治上压迫其他国家，在经济上掠夺其他国家。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方面，必须为其他国家共产党的社会处境和政治前途着想，而不能要求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



为了本国的国家利益做出牺牲。否则，共产党人宣称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会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基于利益权谋、仅仅用于欺骗的政治口号。

5. 共产主义是近代起源于欧洲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的一种意识形态体系，共产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理论设想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路线图，他们提出的最重要、最核心的群体认同是“阶级认同”而非“民族国家认同”。他们的理想是通过发达资产阶级国家的无产阶级发动革命武装夺取政权，在欧洲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体系，进而解放亚非拉国家和各殖民地的被压迫人民。在当时的社会与政治条件下，他们并未设想未来共产党在一些国家夺取政权后与资产阶级国家的交往原则、以及共产党执政国家之间的交往原则。“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在革命实践中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的理论。

（二）马克思和恩格斯严厉批判帝国主义国家发动的侵略战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帝国主义各国以攫取殖民地和经济利益对亚非拉各国发动的非正义战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接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1867：819，829）。马克思认为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以“征服和掠夺”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即使这些战争会给本国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利益。恩格斯曾尖锐地批判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行径：“俄国人已占有了黑龙江以北的领土和该河南岸满洲的大部分土地；他们在那里建筑了工事，进行了铁路线的勘查工作并预定了未来的城市 and 港口的地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恩格斯，1858：39）。马克思在揭露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实质时指出：“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马克思，1859：46）。帝国主义为了攫取殖民地和经济利益，在亚非拉各国所发动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完全不讲信义的非正义战争。

由于作为马克思主义缔造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直接领导一个开展武装斗争并胜利夺取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他们也没有机会思考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应当如何制定本国的外交政策，因此，他们也不可能提出应对抽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现实国家利益二者之间出现冲突时的具体经验对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作为思想家和学者提出了令人向往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和人类社会的长远发展愿景。因此，对于“一个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面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理念与现实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执政的共产党将如何践行这一理念”这个问题，我们只能从马恩去世后各国共产党的夺权过程及掌权后的历史实践来加以分析和讨论。

三、列宁、斯大林在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方面的基本观点

（一）列宁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本观点

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民族主义的性质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绝对不相容：“无产阶级不能赞同任何巩固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反地，它赞成一切帮助消除民族差别、打破民族壁垒的东西，赞同一切促使各民族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和促使各民族溶合的东西。采用其他的做法就是站到反动的民族主义市侩方面去”（列宁，1913b：18-19）。“资产阶级总是把自己的民族要求提到第一位，而且是无条件地提出来的。无产阶级认为民族要求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列宁，1914a：410，437）。

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的“民族主义”，列宁指出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国际



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利益来进行分析：“社会主义者要同一切粗糙的和精致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作斗争。那种要联合同一民族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分裂不同民族的无产阶级的‘民族文化自治’的口号，正是这种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列宁，1913a：100）。这种貌似进步的强调“本民族文化权利”和“本民族政治利益”的民族主义，其实际作用却是掩盖阶级矛盾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

列宁认为在某些内外条件下，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有可能成为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同盟军。沙皇俄国是一个内部各区域资本主义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多部族大帝国，俄国西部少数工业区、南部传统农业区和少数民族聚居的高加索山区、中亚牧区具有完全不同性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俄国在西伯利亚、高加索、中亚和远东扮演着殖民政府的角色。作为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俄国西部大城市的精英和民众受到西欧工业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东部地区则受到亚洲各民族反帝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影响。

由于位于这两大政治运动的连结点，所以俄国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对两个运动都有深刻感触。列宁指出：“各先进国家的劳动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剥削者的国内战争正开始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列宁，1919：137）。“20世纪各先进国家的，特别是大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应当把‘工人没有祖国’这个原则放在自己民族政策的首要地位，而同时绝不否认东欧、亚洲和非洲殖民地落后民族的民族解放运动重大的世界历史意义”（列宁，1914c：839-840）。

列宁认为殖民地的民族主义独立运动有可能成为国际无产阶级斗争的同盟军，对世界革命运动有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但他同时又非常明确地指出，这些民族主义运动的基本性质并不属于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必须明确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任何民族运动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因为落后国家的主要居民群众是农民，而农民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关系的代表”（列宁，1920a：211）。

（二）列宁论国家和国家利益

“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则需要保证自己的利益，不管其他民族的处境如何（不管它们可能受到什么损害）”（列宁，1914b：396）。不惜损害其他民族（国家）的利益去无条件地坚持对本国利益的追求，被列宁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典型立场。在国际关系中，他特别提出：他“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列宁，1914d：451）。

一个国家在对外战争或交涉中获得胜利是否有利于本国无产阶级事业发展这一议题，曾经在俄国革命党人中引发激烈的争议。在1914年，列宁这样批评那些支持俄国对外战争的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逻辑：“社会主义是以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基础的；我的国家的胜利会加速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因而也就会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发挥这种司徒卢威主义理论的，在我国有普列汉诺夫，……司徒卢威主义不仅是俄国的而且也是国际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一种意图，他们妄想‘用温和的手段’杀死马克思主义”（列宁，1914e：469）。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列宁在《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中提出：“立宪会议坚持必须同资产阶级文明世界的野蛮政策彻底决裂，这种政策把不多几个特殊民族的剥削者的幸福建筑在对亚洲和一切殖民地以及小国亿万劳动人民的奴役之上。立宪会议欢迎人民委员会宣布芬兰完全独立、开始从波斯撤出军队、宣布亚美尼亚有自决自由的政策”（列宁，1918a：387）。在这一《宣言》中，列宁表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对外关系中将奉行与传统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完全不同的政策，举出的具体案例是芬兰独立、从波斯撤军、支持亚美尼亚的自决权。列宁指出，领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政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而不能维护沙皇俄国的外交传统，即把政治实体的国家利益（扩大领土、获取资源、统治更多异族）作为外交和对外军事活动的主要目标。

当列宁喊出“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的呼吁时，当时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面对的是德国军队的进攻，“德国军国主义履行各国资本家的委托，要扼杀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工人和农民，要



把土地归还地主，工厂归还银行家，政权恢复君主制。德国将军们想要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在万分危急中”（列宁，1918b：418）。在这种条件下，新生的苏维埃国家与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在这样历史条件下，保卫“祖国”即是保卫无产阶级政权，二者是同一的。

（三）《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的“民族国家”及国家利益

自1648年欧洲各国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以民族国家作为领土主权、行政、财税、司法和政治实体单元的国际秩序逐步建立，并且相关理念和制度规则随着殖民主义在全球的强力扩张而被世界各地政体在外部压力下被迫接受。在此之后发生的国与国之间的军事行动和战争，可以根据跨越国界的具体情况和战争的正义性分为几大类。

1. 一国军队入侵另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目的是割占其领土并获得自然资源，入侵军队对当地居民或者实行直接或间接统治，或者强行驱逐，最极端的行为则是集体屠杀和种族灭绝，如纳粹德国对波兰的入侵。这属于非正义的侵略战争。而被入侵国家军民的反抗，则属于正义的自卫战争。列宁认为：“如果政策是帝国主义政策，就是说，如果它保护财政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那末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策是民族解放政策，就是说，如果它反映了反对民族压迫的群众运动，那末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列宁，1916：23-24）。

2. 一国军队入侵另一个尚未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仍由本土传统权威体制管理的地区（如沙皇俄国入侵高加索、中亚各传统汗国和中国清朝），目的是强占土地和掠夺资源，属于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时两国甚至多国军队先后或同时进入第三国领土（如英、法、德等国之间在争夺非洲殖民地时期发生的战争），目的是彼此争夺殖民地和掠夺资源，这也属于非正义、帝国主义强盗之间的侵略战争。而当地政权和军民的抗击行动是正义的反殖民主义者的战争。列宁指出：“分清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战争是绝对必要的，前者是资本主义分赃的战争，是扼杀弱小民族的战争，后者是反对反革命资本家和挣脱资本家枷锁的战争”（列宁，1921：109）。

3. 列宁指出：“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的和政治上的冲突和斗争，经过不断的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就会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列宁，1917：12）。一个国家内部不同政治和军事集团之间争夺地盘、排除异己的战争。如果参战各方都属于压迫剥削民众性质的社会集团，如中国民国时期的军阀战争，这样的战争属于无道义和非正义战争。如果内战中的一方代表广大被压迫民众或少数民族群、旨在推翻统治集团和旧制度，如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则属于正义的战争。一些由少数民族底层人士领导的旨在推翻本族或异族压迫阶级和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属于正义战争，对这些进步力量或运动进行镇压和军事围剿的战争是反动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如果这些初期具有正义性的战争被外部势力所利用，最终成为外部帝国主义扩张领土、获取资源利益的工具，那么这些军事行动的性质就会发生转变，沦为帝国主义势力的附庸和非正义的力量。

4. 如果一个国家内部发生了以代表统治集团的反动势力为一方、以代表广大民众利益的进步势力为一方为出现的内战——如20世纪4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此时介入内战的外部军事力量中，支持佛朗哥法西斯政权的德国军队是非正义的，而支持民主合法政府的“国际旅”的参战活动则是正义的。

（四）与殖民地解放运动的联盟要根据“落后国家”国情确定“联盟的形式”

在为共产国际准备的文件中，列宁提出“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必然是一方面团结各国先进工人的苏维埃运动，另一方面团结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必须实行使一切民族解放运动和一切殖民地解放运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最密切的联盟的政策，……根据落后国家或落后民族中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来确定这个联盟的形式”（列宁，1920b：217-218）。这里为苏联领导者留下一个选择的空间，即俄国苏维埃政权在与“落后国家



或殖民地”打交道的原则和形式，可以取决于对该国“工人和农民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发展的程度”的主观判断。换言之，如果苏维埃领导人认为该国的民主解放运动不发达，执政的是剥削阶级代表或反动军阀，那么，俄国苏维埃政权与该国打交道时也许就可以不用顾及对该国国家利益的损害，如派红军强占他国领土（如1922年红军强占外蒙古）、坚持维护甚至武装捍卫根据过去沙皇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霸权利益（如1927年的“中东路事件”）。

但是，这类以武力推行的霸道行为（如“中东路事件”）毫无疑问会刺激对方国家全体国民（包括政治领袖、资产阶级、知识阶层、工人农民、广大市民、青年学生以及军官和士兵）的情感，使得他们把俄国苏维埃政权看作与之前的沙俄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同样的强盗国家。这种作法会有助于苏维埃政权与该国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结成联盟吗？正如列宁自己所说：“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列宁，1920b：221）。

在罗伊·麦德维杰夫和若列斯·麦德维杰夫合著的《斯大林——鲜为人知的剖面》一书中，有一章的题目就是“作为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斯大林”。列宁曾经对斯大林提出的联盟宪法草案提出尖锐的批评：“在苏维埃的和苏维埃化了的工人中，会有很少一部分人沉没在这个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垃圾的大海里，就像苍蝇沉没在牛奶里一样”（列宁，1922：756）。“一个格鲁吉亚人，……其实他自己不仅是真正道地的‘社会民族主义分子’，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席莫尔达，那么这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就破坏了无产阶级团结的利益”（列宁，1922：759）。列宁提出：“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列宁，1922：760）。列宁这里提到的“民族主义”，主要是指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等人在处理俄罗斯与苏联其他非俄罗斯人关系时所表现出来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大家知道，俄罗斯化的异族人在表现真正俄罗斯人的情绪方面总是做得过火”（列宁，1922：757）。这显然指的是具有格鲁吉亚人身份的斯大林。

（五）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群体认同模式的宗教

宗教本身即是意识形态，近代发源于欧洲的主要意识形态体系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基督教在17世纪宗教改革之后演变成为基督新教，基督新教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之间存在极为密切的关联，所以韦伯要专门讨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高举共产主义旗帜、号称已将“空想社会主义”推进到“科学社会主义”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则建立在无神论的哲学基础之上。与基督教、犹太教同为“一神教”的伊斯兰教始终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宗教改革，仍然多少带有“政教合一”的中世纪色彩，在当代演变成另外一种极具特色的信仰体系和意识形态模式。而在东亚，作为中华文明主脉的儒学，展现出来的基本特质则是“非无神论的世俗性”（马戎，2018）。

“革命使俄国越过了西方，并使它自己与西方区别开来”。“它以一种在西方创立的、但不能存在于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名义建立起政治经济制度”（亨廷顿，1999：150）。与此同时，我们不可忽视在俄国的中亚和中国的新疆地区，伊斯兰教依然在当地民众中拥有重要的影响力。“在中亚，历史上国家认同并不存在。……人们确实有共同的语言、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是人们中间最强大的统一力量”（亨廷顿，1999：190）。

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中华文明、伊斯兰教体系等世界上几个最主要的意识形态和文明体系之间的互动与竞争，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增添了多彩斑斓的色彩。因此，当我们回顾民国时期在我国边疆地区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与竞争时，伊斯兰教和不同群体成员的宗教信仰差异及其在群体互动和政治斗争中发挥的影响必须作为意识形态因素考虑在内。在一个或相邻几个民族/族群的绝大多数成员信奉某个宗教（如伊斯兰教）的情景下，宗教因素的影响和对“异教徒”的排斥便很容易与其他意识形态因素（民族认同和要求独立建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叠加起来，发挥出巨大的社会能量。这时，受宗教影响的有别于国家意识形态



的社会意识形态与这些族群的民族主义合流，冲击国家利益，就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问题。而当这些族群的民族主义同时又包含一定的共产主义理想时，也就是说，具有分离倾向族群的意识形态在宗教价值、政治理想和民族主义三个方向都有一定的社会动员能力时，问题就会更加复杂，甚至可以说，国家统一将面临严峻挑战。

四、十月革命至 1945 年期间的苏联外交政策

我们可以把以上的分类模式应用于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政权外交政策的分析。

由于沙俄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处于不利态势，面对帝国主义军队的绝对优势和地方民族主义高潮，十月革命后新生的俄国苏维埃政权为了自身的生存，被迫承认了波兰、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的独立。在一战结束后的 1921 年，苏联与独立的波兰签署了《里加条约》，两国瓜分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土地，苏联的国界在 20 年代初期稳定下来。1917-1921 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一个阶段，全部外交工作（包括 1918 年签订的《布列斯特条约》）的首要目标是保证共产党政权在俄国执政，其次是在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战争与谈判中尽可能维护国家领土及其他权益。

1921 年至 1945 年二战结束，可以视为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二个阶段。1939 年苏联和德国签订秘密协议，在东欧划分出各自的“势力范围”。随即两国分别派军占领各自的“势力范围”。无论是德国对波兰西部的入侵，还是苏联对波兰东部、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的入侵，都只能被视为帝国主义的非正义侵略战争。只有当德国军队进入到 1939 年之前的苏联领土后，苏军的抵抗才能被视为正义的卫国战争。

（一）“雅尔塔会议”与全面扩展的苏联国家利益

1945 年至 1990 年苏联解体，这个时期可以看作是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三个阶段。1945 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全面胜利，随即在雅尔塔会议期间苏联、美国和英国对欧洲、亚洲各地区进行了“领土及势力范围”的全面瓜分，苏联是唯一的一个在二战后领土得以全方位大幅扩张的国家。二战结束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又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之间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

1939 年当上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宣称，苏联是“一个从内到外被神秘的迷云所包裹的谜”，“他无法预料未来苏联的行为。但他认为或许有一把钥匙能打开苏联外交政策这道关闭的门，而这把钥匙就是‘国家利益’”（莫斯，2008：251）。在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与“苏维埃国家利益”是一致的，捍卫和扩展苏联的国家利益（领土、资源、人口），就是捍卫马克思主义。这种观念和立场如果被应用到与其他国家（如中华民国）的外交关系上，虽然在形式上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外交政策没有什么区别，但这似乎并不“伤害”其他国家无产阶级和底层民众的利益；如果应用到共产党执政国家（如 1949 年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二战后的东欧各国），追求苏联国家利益与坚持“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之间恐怕就很难说是完全一致。

能够说明斯大林的民族主义立场和对“国家利益”追求的最典型例子是雅尔塔会议。当罗斯福努力说服斯大林参加对日本作战时，在斯大林提出的条件中，有多项内容直接涉及中国的领土完整与国家主权，“西方大国和中国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恢复俄国在 1905 年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失去的对旅顺口的租赁和对远东港（大连）的优越权益以及对南满铁路的权利；恢复苏联在 1935 年签订《苏联和满洲国协议》之后所失去的对中东铁路的权利”（叶梅利亚诺夫，2006：426）。斯大林通过罗斯福向蒋介石施压，以达到满足苏联国家利益最大化的目标。与此同时，美英两国领袖在雅尔塔会议期间接受了斯大林对苏联扩展西部边界的要求，不仅把波罗的海三国、摩尔达维亚和波兰东部并入苏联领土，而且获取了东普鲁士（今天的加里宁格勒）和芬兰大片领土，在多个东欧和中欧国家合法驻军。



形成对比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斯大林对待西班牙内战的态度并不是全力支持反对佛朗哥法西斯军队的国际左派力量，而是在各方面有许多保留，以避免与支持佛朗哥的希特勒撕破脸（莫斯，2008：263）。在亚洲，“苏联……得到了南萨哈林、千岛群岛及其他让步。在东西两个方面，从1939年到1945年，苏联所获得的领土加起来比法国都大，其中还包括大约2,400万人口”（莫斯，2008：285）。斯大林对苏联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然远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理念之上。

在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有关雅尔塔会议的档案中，我们看到斯大林在谈判中表现出来的对于领土追求的欲望远超过罗斯福和丘吉尔（沈志华，1999：22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实现和维系在雅尔塔体系中获得的既得利益，苏联不惜侵犯和损害中国主权，强迫南京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将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古视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是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的历史污点”（熊芳亮，2016：190）。“按照斯大林和罗斯福的约定，‘何时通知中国知晓《雅尔塔密约》内容，由苏联决定’。因此罗斯福回到美国后将该密约一直锁在白宫的保险柜里，连副总统杜鲁门也不知道。……在美国政府的坚持下，蒋介石和国民政府最终同意雅尔塔协定中有关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的安排”（王建朗、黄克武，2016：1056-1057）。

1942年7月9日斯大林与宋子文在莫斯科举行第四次会谈，宋子文宣读蒋介石致苏方的电文：“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1）满洲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关系此点，史大林统帅业已表示尊重此项原则，吾人甚表感谢。……（2）新疆在最近一年间发生叛乱，以致中苏交通隔断，商业贸易无法维持，吾人切盼苏联能依照以前约定，协同消灭此种叛乱，俾贸易交通可以恢复。至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3）中共问题。……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蒋介石表示“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三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之独立”。斯大林当即答以“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对中国共产党，斯大林表示“并不予以支持，亦并无支持彼等之意向”。关于新疆问题，斯大林则闪烁其词，不做正面回答，最后希望中国政府“能觅得一政治解决，必将不恶”（王建朗、黄克武，2016：1058）。

“此时，（新疆）三区革命的地位已降至苏联要挟国民党政府允许外蒙古独立的一个交换筹码。条约（《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换文中有‘关于最近新疆事变，苏联政府重申，如友好同盟条约第五条所云，无意干涉中国内政’字样。9月15日，在伦敦出席五国外长会议的苏联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与中国外交部部长王世杰就‘新疆伊宁事件’进行磋商，莫洛托夫表示，此事件为‘过渡现象’，请中国政府‘放心勿重视’”（王建朗、黄克武，2016：105）。

斯大林对于外蒙古是否有可能回到中国这一涉及中国领土完整的重大问题，也曾对中共领导人做出明确表态。1949年米高扬代表苏共中央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毛泽东……迫不及待地想与米高扬直接讨论外蒙古、新疆等敏感议题，最后迫使斯大林不得不再次发电报以‘内外蒙古统一将威胁中国统一’的理由，明确告诫中共不要奢望外蒙古重回中国版图”（熊芳亮，2016：179）。苏联的外交立场“进一步印证了苏共及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支持‘民族自决’、实施‘自愿联邦’的做法，并不完全是出于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民族理论或出于‘布尔什维克的民族政策’的考虑，其中还夹杂着削弱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代理人力量，以首先确保苏联国家安全和既得利益的政治动机——纵然这将会导致中国的民族分离和国家分裂也在所不惜”。“苏联方面甚至向中共领导人直接表示‘莫斯科的利益应当是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最高的利益’”（熊芳亮，2016：177，180）。换言之，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组织都必须绝对服从苏联共产党的指挥，并且为了捍卫苏联的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本国利益，这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国际主义？这只能被认作是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旗帜为幌子的国家沙文主义和新型帝国主义。“在1956年4月同米高扬的一次谈话中，周恩来要求苏共新领导承认，米高扬1949年访华时斯大林在外蒙问题上犯了错误”（刘晓原，2016：184）。可见中共领导人直至50年代中期仍对外蒙古独立之事耿耿于怀。



（二）中苏两个共产党交往中各自的利益考虑

虽然同为信仰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组织，但是掌握政权后彼此之间的政治互信和对本国国家利益的考虑，仍然是中苏领导人的核心关切。1948年底，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在和国民党政府内务部次长彭昭贤的谈话中，曾明确指出：“一旦一个共产党大国（指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在苏联东部边境出现，这将会给苏联政府带来一连串严重的麻烦”。苏联人担心，一个奉行独立外交方针的共产党中国会在革命胜利之际重翻中苏外交的旧账（刘晓原，2016：185），斯大林宁愿与一个虽受美国支持但愿与苏联妥协的国民党政府打交道，从而获取“雅尔塔会议”中由美国承诺归于苏联的所有权益。

事实证明，当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作为以《共同纲领》为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国家领导人，中共领袖在外交活动中表现得越来越重视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当毛泽东在访苏期间被记者问到他将在此停留多久时，他的答复是“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地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并表示“非常希望斯大林大元帅有公正的外交政策”（中山岭雄，1990：280）。此行最终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与国民党政府同苏联1945年的条约相比，现在处境要好得多了。……另一方面，毛泽东和在他之前的蒋介石一样，也不得不承认一度成为中国清王朝领土的‘外’蒙古的独立”（中山岭雄，1990：282-283）。在中长铁路等涉及中国主权等议题上，毛泽东是这样回顾这次谈判的：“我们同斯大林有不同意见。我们要签中苏条约，他不订；要中长路，他不给；但老虎口里的肉还是能拿出来的”。条约内容中还涉及到“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中山岭雄，1990：283-284）。

对于1950年斯大林与新中国签订的资源开发协定，甚至连赫鲁晓夫都提出了批评：“斯大林跟中国签订了一个在新疆联合开发矿产资源的条约。这个条约是斯大林犯下的错误。我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中国人民的冒犯。几百年来，法国人、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纷纷掠夺中国，而现在斯大林也参加进去了”（中山岭雄，1990：283）¹。有些学者甚至对斯大林在朝鲜战争时期的战略动机也提出了批评，斯大林怀疑新中国会成为第二个他无法控制的南斯拉夫。“这位苏联领袖纵容金日成可能就是避免这种危险，他用的办法是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使中美两国几乎必然相撞，不管是出于偶然或蓄意如此，结果是莫斯科得利。……长时期地切断了中国共产党中的民族主义领袖们和美国统治集团走向勾结的道路，并且迫使中国的领导人扩大同苏联的合作”。“朝鲜战争的结束主要是斯大林死后通过中国的外交努力所致，这时莫斯科正因严重的接班人斗争而处于瘫痪状态”（中山岭雄，1990：294，297）。如果这些分析确有根据，那么斯大林在对华关系中所表现出来的战略导向，完全是传统帝国主义的国家利益追求，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全然无关。

我们对斯大林和苏联政府的外交政策，无论是中华民国时期还是1949年后的新中国时期，都无法简单地以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追求这两个维度来得出结论。同时我们必须承认，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档案材料逐步被公开之后，斯大林作为民族主义者和苏联国家利益捍卫者的形象正在逐步得到加强。目前，国内学术界已经注意到，苏联的政策（包括在新疆的政策）其前后未必一致，薛衔天关于“三区革命”的文章就关注到了这一点（薛衔天，2008）。苏联的新疆政策的制定过程是复杂的，受到内外多种因素的左右，而且也受具体执行者的政治理想和政策理解的影响，前后未必完全一致。这是我们在分析中苏两个共产党的交往时必须加以关注的。

四、20世纪20-30年代中苏关系的几个重要事件

¹ 这个中苏联合股份公司在1954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宣告结束（中山岭雄，1990：298）。



在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权在其对华关系中有几个重要事件，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苏联政府领导人在坚持意识形态立场与追求国家利益二者之间所做出的抉择。

（一）“加拉罕宣言”及后来苏联对其的实质否定

十月革命后掌握政权的布尔什维克党，在意识形态上高举的旗帜是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但是在布尔什维克党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的外交和军事活动实践中，我们又看到苏维埃政权领导人对于苏联国家利益的现实考量。

一个例子是“加拉罕宣言”。1919年7月25日起，俄国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连续发表了三次对华宣言，明确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夺中国的一切领土和在中国境内的一切租界，取消沙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主张和中国举行谈判，‘以建立中俄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建立经常的贸易和经济往来’。特别是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苏维埃政府明确宣布，凡是沙俄‘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新疆社科院历史所，1987：2）。因为相关宣言是由苏联外交官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先后于1919、1920和1923年公开宣布，史书上统称为“加拉罕宣言”。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在这些宣言中公开宣布放弃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的所有领土、庚子赔款、中东铁路以及根据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所有权益。不难想象，这一宣言曾在当时中国各界人士当中激起极大的好感。但是，这些言词美好的动人宣言却从未得到落实，苏联共产党领导人随后的实际行动恰恰表明，他们最终的首要考虑还是苏联的国家利益（领土、矿产资源、贸易利益、特殊外交权利等）。

一些学者指出，苏俄政府之所以提出放弃沙俄从中国掠夺的领土、放弃庚子赔款、归还中东铁路等的“加拉罕宣言”，乃是因为“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强行从中国割让的）占领的那些领土，那时在白卫军的控制之下，并不在苏维埃政权的有效管辖之下，宣言所说的放弃，是准备在这里建立一个号称独立的远东共和国的意思；放弃庚子赔款，是要中国政府不再把赔款送给已经被推翻的沙皇俄国的驻华使节；中东铁路管理局当时是在白俄移民奥斯特罗乌莫夫手中，不能由苏俄政府做主。所有**各项内容实际上都是空话**”（朱正，2017：154）。

宣布放弃那些尚未掌握在自己政权手里的领土和经济权益，而且这样做还有利于在外交上打破各帝国主义国家对自己的封锁，打击内战中的对手沙俄势力，这对于刚刚成立、立足未稳的苏俄政府，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到了1922年，当苏维埃政权已经稳固并控制了除芬兰、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之外绝大部分原沙俄领土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务实”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是首先考虑坚持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意识形态立场，还是优先考虑现实中的国家利益，在苏联领导层中也是有分歧的。

1922年，越飞作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驻华大使的身份来到中国，可是就在越飞开始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时候，他得到俄中央政治局的电报指示：不能以苏俄政府1919年和1920年这两个《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这个指示不允许以两个宣言为谈判的基础，却提出了新的基础。即中国要求俄军撤出蒙古的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把当时还是中国领土的蒙古视为独立国，作为谈判的乙方，目的是尽量拖延俄国撤军。在中东铁路问题上也要保留俄国的特权。接到这个指示，一直怀着世界革命这一信念的越飞觉得很为难。他在9月27日写信给加拉罕、斯大林、列宁、托洛斯基、季诺维耶夫、加米涅夫和拉狄克说：‘我不明白，不能从我们1919年和1920年的宣言中引出具体指示的指示是什么意思……。当然，要某种“手腕”可以把这些宣言说成一纸空文，但我认为，这将是我们的对华政策的破灭，而最终则是我们灭亡的开始，因为在对外政策上我们**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朱正，2017：154）。

从俄共政治局与越飞的来往信件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两种政治立场之间的对立。俄共政治局站在与沙俄政府同样的追求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希望新政权继续占领外蒙古，继续保留在中东路的特权，也完全不会考虑归还沙俄时期从中国强占的任何领土。而在内心仍然信仰“共产主义



的国际主义”理念的越飞则明确指出，如果坚持这样的与沙俄同样的立场，就使苏维埃政权“成了最一般的帝国主义者”，而且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世界革命的推动因素”，甚至最终会成为俄国苏维埃政权“灭亡的开始”。

但是越飞毕竟是苏俄政府的外交官，他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俄共政治局的指示，而且我们在越飞后来与苏俄政府的信函往来中，也看到了他已转向到维护俄国国家利益的政治立场。例如1922年11月《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中，越飞提出：“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去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朱正，2017：156-157）。因此，在越飞看来，当意识形态政治原则（支持蒙古这个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正义斗争）与国家的实际利益（避免与中国政府和4亿中国国民为敌）相冲突时，也只能牺牲前者。

（二）1922年的外蒙古问题

苏联共产党政权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国家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利益的事例，还可以举出很多。这里仅仅从俄共对中国共产党的两次指示中，就可以看出俄共领导人为了本国利益，要求中国共产党为之做出巨大的牺牲，甚至为此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各界民众的威信和社会基础。

第一个例子是1922年苏联红军占领全部外蒙古地区，在红军刺刀扶植下成立了一个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并宣布与苏联正式结盟。此事在中国国内激起全国各界人士的激烈反弹，一致认定苏俄政府就是一个新的帝国主义政权。为了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民意方面获得一些支持，改善苏联的外交形象，俄共要求中国共产党正式表态支持“蒙古独立”。

1922年1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发起召开远东劳动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国民党、共产党及其他团体均有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以及蒙古代表团就中国与蒙古的传统关系对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出乎意料的猛烈抨击。国民党代表奋起维护‘中国’的立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却陷入两难，被迫采取与共产国际一致的观点”（刘晓原，2018：29-30）。

在随后的1923年，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对于目前实际问题之计划》中，在“蒙古问题”一节提出：“我们不但应该消极的承认蒙古独立，并且应该积极的帮助他们推倒王公及上级喇嘛之特权，创造他们经济的及文化的基础，达到蒙古人民真正独立自主之客观的可能”（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25）。在1929年《中国共产党致蒙古境内工人书》中，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蒙古独立是应该的，……我们工人应该赞成蒙古独立，不仅只消极的赞成，而且要积极的帮助。假使中国国民党军阀进攻蒙古的时候，中国工人应该站在蒙古一边，帮助蒙古反抗中国国民党军阀。……拥护蒙古独立！”（中共中央统战部，1991：113-114）。

1919年的《加拉罕宣言》曾经给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各界人士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但是宣言与行动毕竟是两回事，中国人很快就从振奋和感激转变为失望和愤恨。1922年苏军进入外蒙古驱除中国驻军，1924年初莫斯科与北京政府就外蒙古问题的谈判进入了关键阶段，中国共产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配合苏联外交政策。李大钊一度带领一批知识界人士到北京的外交部，公然支持苏联在外蒙古问题上的政策。李大钊当时表示，外蒙古在苏俄的治下会过得更好。这种态度使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极为震惊（顾维钧，1983：340）。1924年外蒙古在苏军保护下“独立”建国，这使中国社会各界民众再次把苏联列入“帝国主义列强”行列，而当时一再表态支持苏联占领蒙古的中国共产党，自然很容易被戴上“苏俄走狗”的卖国帽子。

（三）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

第二个例子是“中东路事件”。一直由苏联当局管理和控制的东北中东路，铁路沿线两侧



各 5 公里的范围由铁路管理局管辖，实际上是个“国中之国”，导致苏联铁路管理局与中国东北地方政府之间在行政管辖、税收、司法等方面出现许多矛盾。由于苏联政府拒绝把 1924 年《奉俄协定》规定应归还中方的非铁路本身之营业如电报、电话、矿山、图书馆、天文台、学校等交付中方¹，1929 年初，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政府因中东路权益与苏联发生一起大规模武装冲突。冲突持续近 5 个月，双方动用兵力超过 20 万，使用了重炮、坦克、飞机和军舰等重型装备，成为中苏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冲突。

1929 年 7 月 19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关于中东路事件的呼吁》，提出“为保卫苏联而前进”的口号，要求中国共产党支持苏联。为了配合苏联在满洲北部的军事行动，斯大林曾策划在中国东北发起一场“满洲革命起义”，由一支中国部队进行，莫斯科暗中支持（刘晓原，2018：67）。之前 1928 年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曾把“保卫苏联”作为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基本任务，提出各国无产阶级“有义务促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并用一切方法保卫苏联不受资本列强的侵犯”。由于各国共产党组织认为苏联是唯一由无产阶级政党执政的国家，因此，有些人真诚地把保卫苏联视为保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据地和大本营。1929 年 11 月 26 日，当时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在中共江苏省“二大”第九次会议上提出实施“反对进攻苏联和保卫苏联的任务，中央已经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即将是全国的武装暴动”。12 月 7 日中共中央发出武装保卫苏联的第 60 号通告，标题即是“执行武装保卫苏联的实际策略就是全国的武装暴动”，提出为武装保卫苏联，要在城市举行总同盟罢工和武装暴动，农民运动要向城市发展和红军攻占大城市，等等²。

但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关系体系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和无产阶级政党如果不顾本国实际处境而去维护一个实质上侵害本国利益、有帝国主义传统的邻国，必然会使这个政党丧失本国大多数民众的支持。沙皇俄国近百年先后从中国强占了约 150 多万平方公里领土，中国民众记忆犹新，因此 1929 年全国各界人士群情激昂，一致支持张学良努力收回沙俄侵略中国的产物之一中东铁路，认为这是维护国家主权、取消外国势力在华特权的爱国行动。因此，当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党员破坏东北军的军事行动、红军政治部提出“武装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这一口号后³，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各界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遭受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一定意义上，当时的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要求其他国家共产党牺牲自身在本国的政治合法性和革命前途来维护实质上作为“民族国家”的苏联国家利益，这是斯大林利用意识形态号召力来维护本国利益的非常自私的做法。

1920 年代初期，苏联政府曾“主动与西藏的喇嘛政府沟通，希望向佛教圣地派遣‘学术代表团’，甚至向拉萨当局许诺，保证在‘俨然独立的国家’西藏受到邻国攻击时，向西藏提供援助。⁴这一邻国可以指的是英属印度，也可以是中国”（刘晓原，2018：34）。由此可见，苏联共产党政府一直是站在大国博弈的立场来处理苏联与中国国内各少数民族地区的。苏共与中共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现实国家利益相比较，仅仅是实现前者的工具。

（四）中国共产党转向坚持中国国家利益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占领东北。国民党政府对此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蒋介石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在对日避让的同时全力“剿共”，被全国各界人士痛骂。在亡国灭种的严峻威胁下，“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甚至在国民党军队也广为流传。

¹ <https://baike.so.com/doc/5566736-5781853.html>（2018 年 8 月 24 日）

²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700236-1.shtml>（2014 年 8 月 5 日）

³ http://news.ifeng.com/history/gaoqing/detail_2012_07/10/15915552_0.shtml#p=1（2014 年 8 月 5 日）

⁴ 《西藏全体噶伦就处理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信函问题给达赖的呈文，1920 年冬》（薛衔天等编，1993，《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 684-685 页）；《致法王达赖喇嘛，1922 年 11 月》（《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685-686 页）；《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致十三世达赖喇嘛函，1923 年 6 月 9 日》（《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第 687-688 页）。



“国民政府这种自外于民族主义潮流的作法，终于重新煽起三一八惨案后渐趋式微的学生民族主义”（沈松桥，2002）。在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之后，红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显现出捍卫中华民族利益的决心。为了争取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促成事变和平解决，建立国共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红军战士取下红五星帽徽，换上国军帽徽，编入国军系列对日作战，八路军在平型关和百团大战等战役中打击了日军气焰。在国共两方面抗战态度对比之下，民族主义高涨的全国爱国青年开始把延安作为抗战“圣地”，“无数青年知识分子怀抱抗日救国之壮志，艰苦跋涉，奔赴延安，充分说明了在当时许多人的心目中，中共远比国民党更有资格充当中国民族的捍卫者”（沈松桥，2002）。中国共产党在“外蒙古独立”和“中东路事件”中留下的卖国负面形象，也从此转变为高举民族主义大旗、挽救中华民族于危亡的正面形象¹。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面对国家存亡的民族大义，任何政党都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中国共产党如果在涉及中华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外交事件中坚持意识形态立场，提出类似“武装保卫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的口号，必然背离全体国民的民意。而一个脱离自身社会、被本国大众所抛弃的政党，是没有任何政治前途的。

结束语

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共产党人通过武装斗争建立的国家，自1917年十月革命到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45年建立南斯拉夫联邦，在此期间苏联作为唯一的共产党国家存在了28年。在这期间，苏联政府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邻国之间在各方面的交往，包括外交、贸易、文化交流、人员往来以及涉及侨民财产、司法、行政管辖权等方面的立场、政策和实际行动，都是检验和考察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如何处理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之间关系的试金石。

1919年列宁领导创建共产国际，总部位于莫斯科，成立时有来自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团体的52名代表参加。共产国际向各国共产党组织派驻代表，各国共产党也向莫斯科派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为一个领导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组织活动的国际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为了使美、英、法、中各国政府解除对苏联利用各国共产党组织“第五纵队”的担心，“为了有效地组织反法西斯的斗争，经各国共产党同意，共产国际于1943年6月宣告解散”²。毫无疑问，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是服从于苏联建立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国家利益的战略考量。

直至共产国际解散前，中国共产党一直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活动。共产国际可以直接干预中共中央的人事、政纲和政策，因此1921-1943年期间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之间的互动是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此同时，在研究民国时期的东北、内外蒙古和新疆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研究各边疆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演变时，苏联政府与中国各级政府之间的互动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共产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始终是各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旗帜。但是共产党在一国执政之后，国家的实际利益必然成为共产党政府领导人的现实考量。我们不能否认在一些问题上，共产党政府会做出有利于他国革命运动而牺牲本国利益的决定，如提供资金支持、派遣指导和作战人员、甚至转让部分领土³等等，但是一旦这一意识形态旗帜与本国重大核心利益发生冲突时，二者孰轻孰重，答案自然就会揭晓。这是人类社会一切政治活动都必须建立在由其社会所决定的合法性基础上这一规律所决定的。至少在国家消亡之前，包括苏共在内的任何政党，都无法做到

¹ 美国学者 Chalmers Johnson 把中共革命胜利的根由，归结为其在抗战期间有效动员了广大中国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转引自沈松桥，2002）。

² <https://baike.so.com/doc/5978049-6191010.html>

³ 如抗美援朝时期转让给越南的面积为9.96平方公里的白龙尾岛。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2/0429/17/6748870_207520312.shtml



为意识形态追求而牺牲国家利益却能够争得和维持政权。

参考书目：

- 恩格斯，1848，“德国的对外政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77-179页。
- 恩格斯，1858，“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40页。
- 顾维钧，1983，《顾维钧回忆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
- 列宁，1913a，“拉脱维亚边区社会民主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纲领草案”，《列宁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4-103页。
- 列宁，1913b，“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35页。
- 列宁，1914a，“论民族自决权”，《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95-457页。
- 列宁，1914b，“论民族自决权”（节选），《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9-402页。
- 列宁，1914c，“单独的札记”（1912-1916年），《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36-846页。
- 列宁，1914d，“论大俄罗斯人的民族自豪感”，《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49-453页。
- 列宁，1914e，“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54-506页。
- 列宁，1916，“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72页。
- 列宁，1917，“俄国革命和国内战争”，《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1-25页。
- 列宁，1918a，“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三版，第386-388页。
- 列宁，1918b，“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三版，第418-419页。
- 列宁，1919，“在东部各民族共产党组织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列宁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140页。
- 列宁，1920a，“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188-239页。
- 列宁，1920b，“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三版，第215-256页。
- 列宁，1921，“论法国共产党的土地问题提纲”，《列宁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7-113页。
- 列宁，1922，“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列宁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三版，第755-761页。
- 刘晓原，2016，《边疆中国：二十世纪周边暨民族关系史述》，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刘晓原，2018，《边缘地带的革命：中共民族政策的缘起（1921-1945）》，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 马克思, 1859, “新的对华战争”,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41-56页。
- 马克思, 1867, 《资本论》第一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第7-984页。
- 马克思, 1871a, “致《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第314-316页。
- 马克思, 1871b, “法兰西内战”,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 第331-389页。
-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7, “论波兰”,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409-412页。
- 马克思和恩格斯, 1848, “共产党宣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第461-504页。
- 马戎, 2018, “中华文明的基本特质”, 《学术月刊》2018年第1期, 第151-161页
- 塞缪尔·亨廷顿, 1999,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周琪等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 沈松桥, 2002, “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 兼论民族主义的两个问题”, 台湾《政治与社会哲学评论》第3期。
- 沈志华, 1999, “中苏结盟与苏联对新疆政策的变化(1944-1950)”, 《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 第213-242页。
- 王建朗、黄克武主编, 2016, 《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民国卷),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 沃尔特·莫斯, 2008, 《俄国史》, 张冰译, 海口: 海南出版社。
- 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编著, 1987, 《新疆简史》第三册,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 熊芳亮, 2016, 《从大清到民国——中国民族理论政策的历史变迁》(1644-1949),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 薛衔天等编, 1993, 《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薛衔天, 2008, “是推进新疆革命, 还是维护自身安全? ——关于苏联调停三区革命的民族因素”,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 《中华民国史研究三十年》(1972-2002)(上卷),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345-359页。
- 尤·瓦·叶梅利亚诺夫, 2006, 《斯大林: 未经修改的档案——在权力的顶峰》, 石国雄、袁玉德译, 南京: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
- 中共中央统战部编, 1991, 《民族问题文献汇编》(1921.7—1949.9),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中山岭雄, 1990, “外交关系: 从朝鲜战争到万隆会议”, 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主编,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1992年第二次印刷。
- 朱正, 2017, “越飞的使命”, 《新视角》总第78期, 第153-158页。
- Connor, Walker, 1984,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Tucker, Robert C., ed., 1978, *The Marx-Engels Reader*,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学术讲座】

斯大林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

——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¹

沈志华²

刚才潘老师讲最近因为中美关系，特朗普在那里瞎折腾，很紧张。现在大家都在说，是不是要开始新的冷战。我不是研究现实问题的，但是冷战问题我还是研究了20年，所以说新冷战马上要开始，或者已经开始，这个说法我不赞同。

冷战的观念是什么？美苏之间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使用除了战争以外所有的手段要击跨对方。这是两个基本的条件，现在这两个基本的条件不存在。

第一个条件，当时美苏之间，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制度是替代性的、抑制性的，性质完全相反，而且一个要替代一个。我的生存是以你的灭亡为前提的，现在中美之间不是这个问题。至少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

第二个条件，就是对抗并不是美苏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现在也不存在这个条件。中国有盟国吗？没有。就一个朝鲜，你敢认吗？你也不敢认，他也不认你。美国倒是有，北约、日本、韩国。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干起来，他们会跟着美国来打中国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别说英国、法国，连日本、韩国都不会。过两天安倍就会来了？干什么来了？调和。

所以，说中国现在跟美国进入了冷战状态或者是新冷战，这个说法不确切。可能有人这样想，但是实际上不是这个情况。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事态恶化下去，处理不当，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斯大林是怎么和美国走上冷战道路，这对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中国的处境和应对的方针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我自己研究的专业，所以我讲讲这个题目。斯大林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战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先讲第一个问题，战后世界的格局，二战结束的时候。

战后世界的格局

当时美国和苏联，当然也有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中国，共同缔造了一个战后的国际秩序，一个规则、一个体系就是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基本的原则就是大国合作和大国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就是建立一个国际统一的组织、建立统一的体系，包括安全体系、经济、贸易、金融，大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美国管美洲，苏联管东欧，英国管西欧，中国管亚洲，这是当时罗斯福设计的。当然，后来把法国又拉进来，到了雅尔塔谈判后期。形成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五个大国一致的原则。对比一战后的凡尔赛体系，凡尔赛体系除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以外，没有形成一个世界整体的平台、规则。所以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为了防止今后人类再走向战争。主导思想是美国罗斯福提出来的，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宣言》，从开罗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斯坦会议等等，都是大国领袖之间在反复地磋商。

¹ 本文系沈志华教授2018年10月25日在上海交大徐汇校区所作演讲速记稿，《近现代史研究通讯》编辑人员对速记稿进行了文字修订。<https://mp.weixin.qq.com/s/uofdGKd8op7021fKveG8Uw> (2019.2.15)

²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冷战史研究中心主任。



罗斯福是比较左翼，从上台执政就搞新政，一直到二战。所以在战争期间他对苏联的态度要比英国友好得多。二战前，苏联跟美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十月革命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结果出了一个法西斯。法西斯连你们俩都要消灭，所以他们俩联合起来把法西斯消灭了。但是法西斯消灭以后，就面临一个新问题：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罗斯福设计的这个想法，就是要消除大国之间对抗和战争的根源。

在苏联方面，斯大林对这一套完全支持、完全赞同。为什么？其实斯大林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政治家。他的目的就是要苏联安全，要发展，什么主义其实无所谓。我们看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答应给苏联的条件，要超过苏联自己的需求，斯大林渴望得到的东西。这个体系能保证苏联的安全，还能保证苏联的发展，他何乐不为。

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到二战，苏联处于一个非常孤独、被资本主义包围的一种状态下，所以他有一种孤岛意识：周围都是资本主义，我要把人家全消灭，人家要把我消灭。所以他他没有安全感。在战前这个局面就改变了，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斯大林曾经想跟英美合作消灭法西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消灭法西斯，但是谈不拢，他的要求人家没法答应。他要求什么？波罗的海三国要归我，芬兰挨着列宁格勒港口的土地要归我，要换一块。英法怎么能答应？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怎么能决定人家国家的命运。希特勒说我可以答应，所以1937年就签订了苏德秘密条约，德国答应波罗的海三国都给你，我不管，你打芬兰我也不管。还有他们俩还商量好，波兰咱们分了算了。因为后来苏联站到盟国这边，这些事现在不讲了。仔细想想二战怎么爆发的，要是没有苏德秘密条约，希特勒会打波兰吗？如果希特勒不打波兰，英国会宣战吗？但是现在提这个不太好，都是盟国，就不提这个事。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

结果希特勒打了波兰，苏联趁机瓜分一半。但是很多人问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为什么希特勒后来又打苏联？实际上是因为斯大林有了进一步的安全需求，但是这个需求，希特勒又无法答应。当时德国、日本、意大利搞反共同盟（轴心国），斯大林要求加入。您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加入反共联盟？奇怪吧？不奇怪。他是有条件的，我加入反共联盟，巴尔干给我。斯大林进一步要求苏联南部边境整个巴尔干给他，希特勒就不答应，他要替意大利想一想，你可以往东边去，印度、阿富汗，再往东边的地盘归日本。这样意大利、苏联、德国瓜分世界，很好。但斯大林不干，非要巴尔干。所以到1940年底最后谈不成。为什么希特勒没有拿下英国就要打苏联，说斯大林这小子比我还黑，所以苏德战争爆发。但是二战后的结果，希特勒没有给斯大林的，罗斯福都给了，整个东欧国家全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只有南斯拉夫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所以雅尔塔体系对苏联来讲，他是受益者，包括远东地区也是一样。关于日本海的问题、蒙古的问题，一会讲到亚洲的时候再说。

这样一来，斯大林很容易也很愿意接受美国的思路，当然他也要表示出相应的诚意，你不能在你的势力范围内搞一党制，必须搞多党、民主选举制，斯大林说这个很容易。所以为什么斯大林1943年要解散共产国际？当时二战还没有结束。共产国际要说解散早该解散，那个时候共产国际在欧洲共产党中已经声名狼藉。一天到晚就是莫斯科的传声筒，苏联和英法合作的时候，给欧洲各国共产党下指示，说法西斯现在是最危险的敌人，你们要支持本国政府，反对法西斯。到了1939年他跟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的时候又下指示，说法西斯还是可以的，是你们本国政府最反动，具有欺骗性，所以你们要起来推翻本国政府。这样就把各国共产党推到了悬崖边上。所以当时多列士（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为什么被法国政府通缉，因为他要推翻政府。

到1941年希特勒一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又下指示，说其实还是法西斯最坏。这样共产国际就没有信誉了。不过一直到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都没有解散共产国际，但是到1943年5月，他突然解散了共产国际。近的说，是为了推动英美开辟第二战场，远的来说，就是要建立起和西方国家（英美）的一种互信关系：我不搞世界革命，我不会再推翻资本主义。他主要是传递这个信号，因为现在学界研究共产国际解散的也不少，因为共产国际有很大的资源，共产国际解散



以后，资源都转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所以说解散共产国际是假的，关键在表明苏联战后的方针不再搞世界革命，不再针对资本主义。

另外为了建立雅尔塔体系，斯大林建立的对外政策是和西方合作，特别是跟美国合作。为了达到这一点，所以苏联在所有自己势力范围内（东欧这些国家），全部搞的是多党制。除了南斯拉夫，它的情况比较特殊。但是南斯拉夫表面上也有一个人民战线，其他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搞多党制。本来（各国）共产党非常高兴，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盼来了，说政权交给我们共产党吧？斯大林说不行，你们还有农民党、民主党、自由党，都跑了，跑了叫回来，就是要在东欧各国建立一个多党制、选举制。

另外在其他不是苏联势力范围内，比如法国，当时法国共产党在二战期间势力特别大。掌握民族军 50 万人，意大利共产党也有 25 万人的军队，还有希腊共产党，这是欧洲三个最大的政党。斯大林分别通知，把多烈士、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等全叫到莫斯科，让他们回去以后解散军队，你们都加入政府。因此法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希腊共产党都交枪了，加入了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也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斯大林给毛泽东发电报，你必须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当时毛泽东都已经下了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立刻占领华北、华南各大城市，中共中央任命了上海市的市长、南京市的市长，江南五省的省长都是共产党员。斯大林说你这样干就是要打内战，这样不行，你赶快到重庆，就是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建立多党制。

冷战的爆发

所以总体上，斯大林是要维护雅尔塔体系，维持跟美国的合作，除了安全问题外，他经济上还指望美国给贷款，好歹给 100 亿、50 亿，战后恢复经济建设。苏联的战后需求也是赞同雅尔塔体系的。但是为什么没有维持住这种关系？1945 年二战结束到 1947 年两年，冷战爆发了。冷战爆发的标志是美国提出了《杜鲁门宣言》。有人说彭斯的讲话是不是铁幕演说，不对。铁幕演说是丘吉尔到美国去做的，他只是说苏联非常危险，要威胁到欧洲，重点是讲英美的特殊关系，因为战后美国军队回到北美，欧洲没有美国什么事。实际上苏联和西方发生的矛盾主要是和英国的矛盾，跟欧洲的矛盾。对美国利益一点都没有碰，一点都没有占。丘吉尔就是担心这个，劝说美国人要管这个事。彭斯的讲话更像《杜鲁门宣言》，就是说美国要管欧洲的事，所以苏联不论在哪里扩张都不行，美国都得管。

对应的事件就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到 1947 年 9 月份苏联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宣布有两个阵营。这距离战争结束已经两年了，为什么？这是要特别注意的。现在我们研究历史材料，可以看到关于冷战到底谁负责任、是谁挑起的，对于这方面的观点争论特别大，这几十年里各种说法都有。我个人觉得，看了这么多材料，我觉得还是美国起到主要原因。美国和西方主要是英国，英国在这里挑逗的作用非常大。最后美国信了丘吉尔。

从逻辑上，苏联不可能挑战美国，他什么都不如美国，怎么挑战？军事不行、经济不行，没有实力，没事闲着跟人家挑战？逻辑上讲不通。事实上他也没有。二战后期发生的所有矛盾，苏联都不是冲着美国去的，没有一条，现在谁能够拿出一条来说，斯大林是冲着美国去的？不是，主要的矛盾是跟英国。为什么？因为苏联在欧洲，英国也在欧洲，他们矛盾是欧洲内部划分势力范围的矛盾，跟北美没有关系，涉及不到。唯一有冲突的是日本，一会我们讲到亚洲的时候再说。但是那时候已经到了波茨坦会议，美国的情况也在发生变化。所以事实上苏联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

既然这样是美国负主要责任，是不是苏联就没有责任了？苏联就是无辜的呢？也不是。可以这样讲，苏联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刺激了美国、刺激了西方。本质的问题还是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了双方之间的疑虑。这主要发生在罗斯福去世以后。罗斯福这个人特别重要，美



国连任四届的总统，就他一个，当时威望特别高。但是他明显是左翼，到二战后期时他已经压不住了，美国就是这样，两个党不能老是你执政，你做得再正确也得靠边，也得换。到第四届大选时，美国罗斯福党内就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原来他第三届当总统的时候，搭档是谁？是华莱士副总统，他比罗斯福还左，很有民主党的传统观念，比较左翼。结果到第四任选举时都没有选他，换了杜鲁门。杜鲁门在民主党内比较中性，本事也不大，平时也不大说话，就让他当。结果罗斯福一死，右翼势力立刻抬头，包括国会内、民主党内的右翼势力。杜鲁门又没有什么主见，所以美国国内右翼势力抬头。他们看苏联时，怎么看怎么别扭，苏联说错了自然是错，说对了也要打个问号。国务卿也换了，财务部长也换了，华莱士后来当了商务部长。美国右翼势力抬头的情况下就开始猜忌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如果估计到这种情况，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就要非常慎重，不要给右翼再增加筹码。苏联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很多问题加剧了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疑虑，主要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苏联的国内政策跟国际政策完全背离。对外政策想得很好，这种报告文件很多，包括斯大林的批示，谈跟美国合作、跟西方合作搞经济安全等等各个方面。跟过去不一样，美国的电影、杂志也可以进来，双方科学家往来都可以。但是国内政策非常保守。因为二战接近尾声时，苏联社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开始走出国门，原来都不许出去，苏联的制度跟咱们文革前差不多，出差得拿介绍信，有单位批准。特别是农民，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不能随便外出。二战一打，苏军几百万人去了欧洲，一到欧洲发现原来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人给国内写信介绍这些见闻，那个时候苏联的公安局都有邮检，写一封信先到公安局，公安局拆开看了以后，没有问题再封上发出去。现在全都是档案，我看到苏联公安局邮检留下的文件，都是讲他们在欧洲所见所闻。有些人说到了匈牙利，占领了匈牙利，见了洛米卡，说家里还挂着壁毯，那是旧时俄国贵族家里才有的，他们家里还有马桶。怎么战败的资本主义比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水平还高，不是说我们是最好的吗？所以老百姓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传十、十传百。再一个是农民对集体农庄的反感、厌恶，到战后已经可以随便讲了，过去谁也不敢讲。一是希特勒来把苏联的基层组织破坏了很多，再加上战争，政府对农民的束缚也放松了。再一个是知识分子可以出来说话，因为开始允许与西方交往，所以写文章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干部，在干部当中也有一批人觉得苏联需要变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我发现一个1947年2月起草的文件，苏共十九大报告的提纲，我们都知道十九大后来没有开。我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文件，但可以推想，这个时候要开十九大（1947年初），是什么方针呢？一看这个文件就知道，和苏共二十大的文件非常相似，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放权简政，都是这些措施和想法。虽然后来没有执行，但说明在党内也有一批人认为苏联应该进行变革。

当时整个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要重整，无论国内和外部环境，都是苏联体制进行变革最好的一次机会，这个时候比列宁那个时候好。顺便说一句，苏联最后垮台核心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科技发展不断地调整，但是苏联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二十年代搞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列宁去世的比较早，没有搞下去。第二次就是战后，这个机会比20年代还好。至少有国际环境，二十年代时没有国际环境。第三次没有搞成就是赫鲁晓夫（60年代），没有走上改革调整的道路。

为什么战后苏联没有改革？他担心政权不稳。斯大林认为这些改革的要求都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就是要推翻苏共的领导。所以从这一点担心出发，他对国内加强了控制，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1946年初）。日丹诺夫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他拧紧螺丝钉，对言论、出版严格限制，提出了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检查文学作品、文章、报纸，搞得鸡飞狗跳。



特别是斯大林出来站台。1946年2月9号斯大林公开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非常重要。他在莫斯科的选举演说中公开讲，说苏联的老百姓不要胡思乱想，苏联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我们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没有这个制度，我们不把国家的精力都放在重工业、军事上，我们能抵抗得住法西斯的入侵吗？所以二战的胜利证明了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第一个主要观点。第二个主要观点，是认为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资本主义就是战争，把原来列宁讲的一套又拿出来，帝国主义是腐朽的、没落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因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所以我们要准备打仗，又因为我们要准备打仗，所以你们还得过苦日子，还得把国家的财力集中到重工业、军事工业。大概意思是这个。

这个话本来是说给国内的人听的，说给苏联老百姓听的。但是在美国人听起来，感觉苏联又要打仗，跟谁打？跟资本主义打。至少在美国人的理解当中，他认为苏联又回到战前的状态。所以斯大林讲完没多久，丘吉尔就出来了，他到美国发表了富尔顿演说，说铁幕已经拉响，就是“铁幕演说”。因为铁幕演说比较有名，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铁幕演说，其实当时并不重要，对美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苏联驻美国大使、驻英国大使当时都写回来很多报告给斯大林，说不要担心，虽然丘吉尔在这里说话、放狠话，但是对西方社会没有太受影响。为什么？就是因为丘吉尔挑拨性的语言，美国人不大爱听，他们本来在北美待得好好的，非得弄到欧洲去跟苏联对抗，这有什么意思。所以美国人本能有一种抵触。当然也有人很赞同，比如说杜鲁门一天到晚拉着他到处走。但是从舆论报刊到大多数人并不大在意。

后来又又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凯南的电报，这个对美国政界影响非常大。凯南原来是一个大学教授，一直从事苏联问题研究，很有权威性，当时他在美国国务院，只是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参赞。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后，美国国务院要求评估一下，到底现在苏联是什么状态？是不是要进攻美国？大使馆要做评估，正好大使史密斯不在，这件事就交给凯南。

凯南发回一封8000字的电报，那是一篇论文呀。他写的什么呢？题目是《苏联的行为及其根源》，他首先定义苏联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为什么？他从历史上介绍俄罗斯怎么从一个大国一点点扩大到欧亚大陆，所以这个民族的传统就是扩张。第二，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就是扩张，因为他要搞世界革命，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扩张，把全世界资本主义都消灭，所以苏维埃的俄国一定是扩张的。把苏联的行为确定为扩张，苏联行为的根源就是传统和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主义。所以美国该怎么办？遏制，必须得遏制苏联！不能让它随随便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遏制战略就是这么出来的。当时影响非常大，国务院如获至宝，印发给各个部门，大家一看这分析得多透彻。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就是凯南说的这两条都不是现实存在，而是从意识和理论上来讲的。第一，扩张，苏联那时已经不需要扩张了，需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原来彼得大帝设想三个出海口，苏联至少拿到了两个，土耳其海峡至少也有通航权，波罗的海没有问题，加上太平洋，苏联周围都是他的势力范围，还扩张什么呀？一扩张势必跟西方产生冲突，所以没有扩张的需要。第二，苏联的观念也发生变化，你说它是共产主义，那会早就放弃了，解散共产国际就说明斯大林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方针。所以凯南这个电报本来没有多大道理，但是正好迎合了美国右翼势力的思路，就广为传播。这样，美国的反对声音就更大了。回过头来看，当然这是斯大林讲话引起的，本来斯大林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是说给苏联人听的。但美国人听了很不舒服，英国人又折腾，一步步造成了美国国内对“苏联威胁论”的定位。

斯大林的一些做法也让美国人不高兴，什么做法？斯大林对周边国家，主要是指东欧、欧洲势力范围内、责任区范围内的政权不放心，过度干涉人家的内政。这又是为什么？他不是允许东欧各国搞多党选举制吗？但是斯大林自己不知道什么是选举，因为苏联的选举都是假的，斯大林的选举演说，结果还用说吗？不用说也得选你，敢选别人吗？东欧就不一样。东欧真是有几个党在那里竞争，但是苏联又不熟悉这个，专制惯了，没有搞过选举，说这东西不太好，会让资产阶级上去掌权。一开始斯大林给东欧各国共产党出的主意是：你们就占住几个主要的部长，比如说



安全部长、国防部长，其他的都给其他党，教育部、农业部都给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从 1944 年开始到 1946 年底，因为解放的时间不一样，在东欧几个国家的选举当中，是苏联看着操作的，但是具体操作又不大会，想弄得漂亮一点，要么改选票，要么把选举的人给逮捕了，结果让人家特别反感：说咱们这还是选举吗？民主党、自由党人家看到不行就跑了，跑到西方去，这又是逼走了。

斯大林本来对东欧的设计挺好，树立一个捷克斯洛伐克的样本，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总统贝奈斯比较亲俄，恨西方。因为当年德国攻打捷克，结果英法不管，结果德国先占领捷克，然后才打的波兰。所以捷克人本身就有一种对西方国家的反感，之后捷克被苏联从纳粹手里“解放”，因此对苏联很亲近。贝奈斯这个人在捷克的威望特别高，所以斯大林想借助贝奈斯总统，在东欧设计一个模式，看起来不是共产党在这里管，但实际上共产党说了算。但是很难实行，主要没有搞过民主制、没有搞过选举。一会儿波兰出事，一会儿匈牙利出事，一会儿保加利亚。西方人认为斯大林的承诺都是假的，说什么搞多党制、选举制，都是假的。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东欧共产党也在这里鼓动，一会“上眼药”，一会谎报军情，夸大敌对势力。所以苏联也担心，这样就造成了在东欧国家民主选举制的问题上，引起了西方极大的反感和不满。这也是很重要的原因，走到制度性的分歧和对抗边缘。

第三个因素，对外政策斯大林总体想和西方合作，对雅尔塔体系很满意，但是这个人太贪婪，而且特别机会主义。有便宜他一定要占，有便宜不占，你傻呀！表现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伊朗问题，一个是土耳其问题。怎么说有便宜可占呢？二战时担心伊朗油田被德国人控制，所以英国和苏联出兵占领了伊朗，当时商定二战结束以后三个月撤军，英国人撤走了，苏联不走。为什么不走？他跟伊朗说，北部的油田你得租给我。这本来就是一件商业的事，可以慢慢谈。但是他不，他把军队往这里一搁，你不租给我，军队就不走。伊朗当然也不愿意，加上西方国家撑腰，就硬顶着。斯大林就煽动库尔德人自治，建立了库尔德人民党。你再不同意，别说油田，这块地都是我的。结果伊朗一纸状子告到了联合国，说苏联斯大林欺负人。

现在俄国档案都解密了，关于伊朗危机，苏联一开始怎么想、怎么策划。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石油。要石油就要石油，为什么一会派军队，一会策动人家自治，还煽动人家党，其实他没有做任何占领的准备。伊朗一告，美国就不高兴，说你是仗势欺人。杜鲁门一个电报打给斯大林，说你不能这样做。斯大林那会儿不愿意跟美国闹翻，所以立刻回电说，多大的事，不去就完了，不要了，给谁都行。美国也劝伊朗，说你跟苏联签一个合同就可以了。结果两个国家就签了租用油田协议，这个事就没了。苏联撤回军队后，伊朗随即就把合同撕了，也没有达到苏联的目的。但是这个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说斯大林仗势欺人，对美国你不敢碰，但是对周边国家，你不能想欺负谁就欺负谁。

这个事结束以后，又出现了土耳其危机，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事。1922 年，20 年代初当时所有黑海沿岸的国家和土耳其共同签订了一个《蒙特勒公约》，规定凡是黑海沿岸的国家都可以自由通行土耳其海峡、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亚海峡。二战后期的时候土耳其和英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斯大林就有点担心。说如果要是让英国控制了土耳其海峡，我的黑海舰队就出不去了。因为舰队必须要经过土耳其海峡才能达到爱琴海，再到地中海。所以他就跟土耳其政府建议，你得让我在海峡地区建一个军事基地，要一个军港。土耳其说不行，这是我们的领土，你怎么可以说在这里建就建。说不行那好，我们两国之间有领土问题，马上在地图上划出一块地，说这些地是俄罗斯的，翻历史旧帐。土耳其就害怕了，海峡不给你，你就划领土，于是又一纸状告联合国。美国一看又来了，于是把第六舰队开过来。斯大林一看，“至于吗，就算了算了”。这事就完了，这就是土耳其危机。但是这个事让英国人抓住了，说这就是苏联扩张的表现。

还有一件事，跟土耳其危机同时发生的是希腊危机。希腊危机是冤枉苏联，原来档案没有解密，谁也不知道。英国是这么说的，说希腊危机就是苏联造成的。怎么回事？原来希腊共产党加



入政府，放下武器，但是他们在政府里面待着憋屈，就像资产阶级政党在东欧待着憋屈一样，因为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早在 1944 年 10 月有一个百分比协定，丘吉尔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两个人坐在那里喝茶，说将来东欧怎么分？丘吉尔拿了一张纸画，罗马尼亚我 50%，你 50%，哪里我 80%，哪里你 90% 等等。斯大林拿着红蓝铅笔打了一勾，但是后来否认。但是这张纸找到了，档案一解密又翻出来了，确实有，当然事情后来有些变化。在那个时候斯大林已经确定，英国你把东欧让给我，我把希腊让给你，包括希腊共产党全给你，不要了。所以当时谈好了。

斯大林这个人还是比较守信用，他不能自己违反。所以希腊共产党在政府里待不住，几个人一商量还是拉杆子上山打游击，拉出来就找苏联，你得支持。当年你把武器让我们都交了，现在受气，只能又出来。苏联说现在不行，国际关系很复杂，什么时候你们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政府，我们就承认。希腊共产党说建个政府还不容易，第一天上山拉杆子，第二天希腊民主共和国成立了，你们承认吧。苏联说我们先看看，等别人承认了我们再承认。所以这个谈判，苏联在道义上不能不支持希腊共产党，都是共产党。但是实际上他又不想惹事。因为这是明摆着是跟英国对着干。所以苏联就不想让他们折腾，钱象征性地给一点，吃的、喝的总得给，但是武器装备绝对没有。所以英国人、西方人完全是另外一种印象、一种概念，认为各国共产党背后肯定都是苏联支持，没有别人。所以就把这个事安到苏联头上。这也说明意识形态对立会造成一种彼此互疑，不管什么事，对方都会往最坏的方向考虑。希腊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马歇尔计划

这样到了 1947 年年初时，美国接受了英国的鼓动，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宣言。其实就是在国会会有一个讲演，讲演的目的是说，我们要援助欧洲，支持欧洲。丘吉尔的话语比较能打动人，因为 1946 年欧洲特别寒冷，缺煤、缺粮食，战后社会混乱。所以丘吉尔有一个结论，认为贫穷、饥饿、寒冷会导致混乱，混乱的结局就是革命，就会给苏联一个可乘之机，到那时候整个西欧就会丢给苏联。他这样一讲，美国人就接受了。所以，杜鲁门宣言的结果就是美国重返欧洲，原来苏联跟欧洲的矛盾就变成了跟美国的矛盾，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其实杜鲁门宣言发表以后，苏联还是采取了让步的政策，没有全面抵制，斯大林还是抱有一线希望，5 月份在莫斯科开会，莫洛托夫跟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谈判态度强硬，所以会议不欢而散，但是斯大林下来专门找马歇尔谈了一次，这个谈话也解密了，可以看出来斯大林还是想力挽狂澜。当时氛围非常紧张，斯大林还是想说服美国，苏联没有想挑战美国的意图，所以还是要合作。苏联内部也很紧张。苏联本身想加入西方这个体系，但是因为太不熟悉，就特别谨慎。比如布林顿森林会议要建立国际经济体系，要搞世界银行等等。苏联开始也派代表去了，其实他对整个资本主义运行不大懂，回来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小心为上，不去了，免得让人给玩了。所以苏联就没有加入，除了加入安理会，其他的机构一概不参加。苏联的经济运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自己在体制内循环，不想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加入，后来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那个时期苏联非常谨慎。

这时美国已经下了决心，所以马歇尔回国以后就到哈佛大学做了演说，就是著名的“马歇尔计划”，6 月 5 号发表的。马歇尔计划的发表就是杜鲁门宣言的经济版，杜鲁门是一个政治宣言，但是得有实际行动，就是马歇尔计划，拿大笔的钱援助欧洲，恢复经济搞建设。

但是苏联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马歇尔计划到底是什么？找了瓦尔加（经济学家）、莫洛托夫、驻美国大使、驻英国大使，说你们研究研究马歇尔计划是什么？研究完了以后一致认为，根据《资本论》的描述，这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爆发，他们资本过剩、钱太多，没有地方去，资本输出。斯大林说既然是资本输出，就给咱们输出一点，咱们去要钱。莫洛托夫带着 200 多人去英国要钱，而且鼓动东欧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要钱去。结果根本谈不拢。明里面讲这



个援助是包括苏联和东欧，也包括西德（德国问题一会再讲），其实内心不想给苏联。苏联的想法很简单，你的钱都没有地方用，借给我，我要多少你给我多少，我连本带息还给你，就这么简单。美国人说不行，你拿这钱要干什么？你要盖工厂还是要修水坝，你得把水文、地址资料拿过来，要有可行性报告。苏联说这怎么行，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就要把情报先给你，最后怎么都谈不拢。

其实那个时候美国人就下决心不能给苏联，是苏联的一厢情愿。这个时候斯大林得到克格勃的一个情报，在巴黎的苏联特工窃听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记录，两个人商量以后才知道，他们原本就不想给我们钱，还把我们全忽悠来。这样苏联和东欧国家代表就全走了，全撤了。撤了以后，因为第一轮没有谈成，还想着第二轮什么时候谈。苏联代表回来一商量，以后也不要去了，去了也不会给你。

但是第二轮谈判时，东欧国家还是都去了。第二天斯大林起来想到不行，别这些人去了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我甩到一边，谁都不许去。第二轮谈判东欧国家都不许去。目的就是把这个事搅黄了，我得不到，谁也不能得到。他越走这一招越错，马歇尔计划的目的是要跟苏联做经济上的切割。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斯大林本来要是把东欧留在这里，东欧留在这里还有一点连带关系，但是他又担心挖墙脚，自己控制不住东欧。所以整个做了切割，不让去。后来东欧各国确实没有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又出了一个事。

出了什么事，波兰说是苏共中央发了通知不许去，波兰共产党接到了，但是波兰外交部长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不听。捷克共产党也接到通知，但是也执行不了，为什么？因为在议会通不过。斯大林一想，这弄的是什么联合政府政策，这不是作茧自缚吗？现在我说话都没有人听了。他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全部拉到莫斯科关到一屋里，让他们好好想，想不清楚，谁也别出来，饭也不给吃，关了一夜。这样没有办法，给贝奈斯打电话，鼓动议会通过了。结果是波兰议会部长跳楼自杀了，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反正是死了。把这个障碍排除了，大家都拒绝了马歇尔计划。但是实际上这个结果对苏联非常不利，对苏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完全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科技发展潮流之外。

带来的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斯大林认为联合政府的政策不能再执行下去，他说话没有人听，还是得搞一党制，一句话说完，大家都跟着走，好办事。所以在东欧各国重新推行一党制，做法是让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并，选举上就占了多数。东欧没有叫共产党，至少开始没有，后来70年代罗马尼亚改名，原来都是社会党、统一社会党、工人党、劳动党，就是因为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所以对东欧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再加上这个时候西欧也出问题。法国共产党多列士这个人比较狂，法国共产党势力确实很大，有四个内阁部长，而且还当了副总理，所以在内阁里面经常跟人家挑事、闹事，美国早就烦了，背后让社会党把他给卖了，他自己不知道。后来越南胡志明成立一个民主共产党，政府到底承认还是不承认？那是法国殖民地。再一个汽车工人工资的问题，好几个事加在一起，双方闹起来，多列士带着人退出政府，他以为退出就是内阁倒台，重新选举。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你退出正好社会党上来，就把共产党排除出去。意大利也是这样，陶里亚蒂也被人赶出去。这样在欧洲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斯大林原来设计的联合政府政策就彻底破产。

斯大林认为这样不行，必须重振旗鼓，所以在9月份召开了共产党情报员会议，共产党都不听话了怎么行？原来好在有第三国际，有组织体系，有一个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说话你得执行。共产党情报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从策略上讲，斯大林还是比较明白、比较聪明的人，他知道不能跟西方对抗，现在没有这个实力，所以设计的策略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御。所谓内线进攻，就是把势力范围内的党管好、步调一致，凡事请示汇报等等，恢复到原来共产国际有上下级关系的状态，表面上没有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是这么样。对外不要到处出击。所以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时候，不让希腊共产党参加，说你一直要搞革命。共产党情报局口号、战略上要重新革命，搞世界革命，但是希腊共产党正在革命，不让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在革命，1947年内战，在报告里面



提都不提。所以成立这个组织不是策划向西方进攻，而是要守住自己的阵脚。它的战略是和美国对抗，就提出两个方针，这两个方针最要命。一个方针是建立社会主义阵营，日丹诺夫的报告讲，整个世界划成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激活和重新提出世界革命的方针。因为在两个阵营当中，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亚洲大部分地区既不是资本主义阵营也不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地带就被裹胁了，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名义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就是这么加入的。还有亚洲各国的共产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等，各国共产党都提出来要归苏联领导，导致冷战向亚洲的转移。

苏联共产党设计对抗美国的战略目标，实际上就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道路上。又重新回到你死我活的状态，两个国家你死我活，就不可能和解，我要生存你必须得死。这就是共产党情报局当时确定的针对美国的冷战战略，重新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重新搞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这时候冷战态势在欧洲就定格了。冷战在欧洲定格的过程当中，斯大林不想在欧洲跟西方发生冲突。因为自己的实力不行，最典型的就是1948年柏林危机。柏林危机中，美国步步为营，斯大林有一个错误判断，认为德国分为四个区，西方连一块即西战区、另有苏战区。但是柏林是在苏战区内，为了名义上表明公平，把柏林也分了四块，那个时候没有柏林墙，就是一条街，这边是东柏林，那边是西柏林，随便过，西柏林喝酒，东柏林上班，这让苏联很不舒服，视为眼中钉肉中刺，老想把他们赶出去。而且他认为这没有什么，本来就是个名义上，你非得在柏林弄一个西柏林。所以就封锁柏林，加上柏林的问题也比较复杂。经济问题，西方想把自己的货币马克统一，苏联不干，最后就吵。苏联封锁柏林，他认为封锁完美国就撤走了，但是美国不但不撤，还封锁东西德。结果把东德就锁了，西德经济比较发达，很多人上班在西德。而且柏林也封锁不住，人家弄一个空中走廊，每天几百架次往这里送大米、白面、自来水，全是空投、空运，弄了一段时间，斯大林一看不对，最后宣布解除，而且无条件解除。这个事苏联就感觉到跟美国对抗力不专心，步步失招。

斯大林的亚洲政策

就在这个时候亚洲的事情出来了，给苏联一个强心针，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本来苏联跟美国都不想在亚洲发生碰撞，其实美国来欧洲就有点迫不得已，不想来。再弄一个亚洲，那么又贫穷落后，不大想管，苏联也不大想管。原来说好，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远东地区有三块，一是日本海、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群岛，这是在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夺走的。二是外蒙古独立，苏联跟中国就有一个中间地带，和东欧的作用是一样，是他的卫星国。第三是苏联控制东北，主要就是旅顺港、大连港和中长铁路（即中国长春铁路），两个港加上一个铁路，为苏联在太平洋提供了一个出海口和不动港。这是整个远东的设计，设计得非常好，而且美国都同意，雅尔塔远东秘密协定就是这个。而且美苏合作逼着蒋介石签了一个中苏同盟条约，这样外蒙古独立就合法化了。这些在亚洲地区的安排，美苏双方都是满意的，不满意的就日本。苏联在波茨坦开会时和美国说好了，日本本土和太平洋的日军由美国人去消灭，大陆上的关东军由苏联去消灭，苏联也同意，所以出了150万大兵去打关东军。但是没有说好朝鲜到底是谁占领。实际上是苏联占领，因为苏联离得近。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军队马上从陆地进入到朝鲜，再加上海军，两路军一起。所以到日本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过了三八线。美国就着急了，好歹你得给点面子。朝鲜受降有一个地盘。美国人设计了一下，其实三八线是特别随意划的，就是把朝鲜一分两半，美国人想的是苏联会讨价还价，我提三八线他肯定不同意，美国都准备接受把汉城给你，汉江给你，到三六线都可以。没有想到斯大林没有讨价还价，说行，就三八线。美国人当时就傻了。斯大林这么精明的人怎么脑子进水了！其实没有，斯大林脑子很清楚，三八线向西延伸就是旅顺、大连，都在三八线椅背，包括内蒙的大部分地区，三八线向东延伸就是日本的北海道。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苏



联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军队。结果美国人耍花招，杜鲁门说这事不归我管，你得问麦克阿瑟，他是远东盟军总司令。结果阿鲁诺夫（编者注：疑为马利诺夫斯基，时任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找麦克阿瑟，麦克阿瑟不同意，说不可能。结果苏联就吃了一个哑巴亏。所以后来为什么战后在日本问题上，苏联没有发言权？主要是在本土没有驻军，如果苏联在日本本土有驻军，现在国际局势完全不一样。

吃亏就吃亏了，苏联也认了，总体上斯大林是满意的。但是国共内战一打，就把这个事给搅了，主要是共产党打赢了，共产党打输了，倒没有什么，不料共产党打赢了。苏联的想法特别简单，原来是根本不搭理共产党，说他们都是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跟美国人就把中国的问题处理了，而且跟蒋介石条约也签了，东北是我占领的，别让第三国来。

发生了什么事？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这谁也没有想到。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八路军、新四军离东北很近，从陕西、河北就去了，国民党还远着呢，在缅甸、云南大后方。于是苏联就面临一个问题，共产党先来的，地盘给还是不给？他决定不给，如果给了共产党，我就违约了，所以苏军把共产党赶走了，赶到农村。你们在可以进入东北，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就行。离大城市至少50公里以外，别让我看到。斯大林就想等着国民党来接受，他履行条约，然后东北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他就满足了。但是没有想到蒋介石信不过苏联，而且他要跟共产党争东北很着急，他没有办法，只能借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来运送军队，因为自己没有。这下就犯了斯大林大忌，国民党军队自己来就可以了，但是你坐美国的军舰、美国的飞机什么意思？迫不得已，苏联就得打中共这张牌。所以飞到了长春机场，美国飞机降不下来，为什么？苏军把机场交给共产党了，说你赶快来，要不然国民党就下来了。但是等国民党走了，又把共产党给赶走了，还是去农村待着吧。军舰也是，国民党军队坐着美国军舰来了，要登陆，就赶快通知共产党，说国民党马上来，你们赶快进入阵地，苏军就撤了。国民党登陆不了，因为岸上这边老是开炮，问是怎么回事？苏联人说不知道，说可能是土匪吧。

结果折腾一阵，后来还是没有挡住。国民党的飞机、海上走不通，就从陆地上走。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都是从陆地上一步一步往北开，共产党军队挡不住，全是美式装备。结果四平一战中共失利。这个时候马歇尔来调停，苏联也希望别打了。中共最后提出一个建议，干脆我们建立一个东北自治共和国，由中共领导，中共把河北、山东苏北根据地全部放弃。很像日内瓦会议解决越南问题，17度线。结果美国也觉得可以，苏联当然赞同。苏联不赞同，美国提不出这个方案，但是就是蒋介石不同意。蒋介石太过高地估计自己，他认为三个月共产党就完了，我刚丢了一个外蒙古，再丢一个东北，还算领袖吗？不行，坚决不干，不干就打。结果打输了。共产党一进关就出了问题，因为过了长城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在东北没有问题，美国也不会干预，但是在中原打起来，苏联管还是不管？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的思路完全一样，苏联不想管，斯大林怕苏联管了，美国有借口出兵，本来美国军队在青岛都有，再派陆军和空军来，这不成了苏联和美国在中国打仗！美国其实也不想干预这事，美国担心的是，如果我去，苏联就有借口出兵了。关键是美国跟苏联都不想在这里碰撞，所以给了共产党机会，中共就把蒋介石打败了，打败了以后，问题更大了。

1949年年初，基本上大局已定，国民党三大主力都被消灭了。百万大军陈兵长江，过去有一个说法不对，说斯大林阻止中共过江，其实不是，来来往往的电报都公布了，其实不是阻止中共过江，只是当时国民党提出和谈，斯大林不想让美国主导和谈，而让苏联来主导和谈，因为到12月苏联已经做了基本判断，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预，如果要干预早就干预了，现在国民党主力都没有了，美国人来干什么，不会来。但是很可能美国要政治干预，如果共产党拿了天下，美国跟中国共产党勾搭起来，对苏联就是威胁，连东北美国都要染手。所以斯大林的主要目的，不是阻止中共过江，而是阻止美国主导国共和谈，所以他给毛发了电报，说我接到电报照会，他们



提出和谈，你不能让美国人来，所以我给你起草了一个电报，你把电报发出去。他给毛泽东起草了电报，谁都能调停，就是美国不行，而且我们主张是由苏联调停。这么一封报告。

没成想毛泽东根本就不想谈，谈什么谈，我过了长江，天下就是我的了，我谈什么？所以他给斯大林回了一个电报，说没什么，和平谈判那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是人都看得出来，这事你还不明白？我给你起草一个回电，你就这么答复国民政府，他替斯大林起草了一个回电，说苏联不干涉别国内政。斯大林一看哭笑不得，领导苏联和世界革命这么多年，哪有人给我起草电报。但是这个时候的主动权在中共手里，中共势大，所以他没有办法，表示说是你理解错了，我不是说非让你和谈，只是和谈的旗子你应该抓过来，你只要提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和谈条件也谈不成，你想打过江就过江。毛泽东一看这个电报，也顺坡下驴，既然这样没有问题，我已经提了八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惩治战犯，第一个战犯就是蒋介石。后来这个事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斯大林就嘀咕，毛泽东究竟是什么人？从1947年毛泽东就发电报给斯大林，三番五次，一直到1948年11月，三番五次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斯大林就不让他来，为什么不让他来？他怕担责任，中共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你这个时候到莫斯科，不就是告诉人家，这个事是我做的。这会儿更不能让他来，因为不了解这是些什么人呀。派米高扬去一趟，于是就有米高扬秘密访问西北坡，1949年2月。这个结果非常好，中共和米高扬所有的谈话记录和斯大林来往的记录都解密了。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又能做事又会说话，涉及到中共利益的，寸步不让，但是到这会儿又好话说尽，你看这谈话记录就是吹，吹捧苏联，说苏联走过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中国共产党就是要跟着苏联走，你们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这话说了三遍。米高扬一反馈，斯大林觉得还不错，所以苏联真正决定要跟中国共产党结盟，就是米高扬回去以后。一个证据就是，原来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党的系统决定，你看档案全部是在党的会议上做决议，政府从来不干预这事。因为中共不是政府部门，你是在野党，但是1949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做了决议，援助中国政权。说明苏联支持中共也开始公开化。但是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好话，米高扬也没有表态就走了，斯大林是接受我还是不接受？所以就说你刘少奇你赶紧去一趟莫斯科，咱们也秘密访问。

后来历史上这个事闹了很大的误会，因为档案没有解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刘少奇什么时候去的，但是都知道毛泽东6月30号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这个都知道，但是什么因果关系呢？大家不清楚。后来1949年写回忆录，说刘少奇是7月4号去，就是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以后，刘少奇去的莫斯科，因果关系就是中国先向苏联“一边倒”，然后刘少奇再去征求苏联的意见。其实不是，刘少奇是4月27号去，当天晚上就跟斯大林谈了，谈得结果非常好，斯大林说刘少奇有什么要求尽管说。刘少奇要钱要枪要炮要海军、空军，开了一大单。斯大林说没有问题，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要什么给什么。第二天4月28号刘少奇把电报发给毛泽东，谈得非常好，斯大林完全接受了，这样毛泽东才下了决心发表“一边倒”的宣言。

当中还有一个事，美国人当时也在探中国共产党是跟着苏联还是不跟他走，还是怎么着，也想摸这个情况。南京解放的时候，司徒雷登没有走，周恩来当然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派黄华去跟司徒雷登接触，而且告诉司徒雷登，你到北平有可能见到中共高级领导人。不知道为什么司徒雷登没有把这个事告诉白宫，我查了他的日记还有很多美国档案。（周恩来）也可能觉得传话可靠真实还是怎么样，不是直接跟他说，而是托人传话。所以23号他要回国述职时，黄华给周恩来发了电报，说司徒雷登要回国了，上次跟他说来北京的事，他也没有回音，是不是再问问他。他走之前让他来一趟。时间是6月23号，毛泽东亲自在周恩来的回电上加了一句，请转告司徒雷登还有北上这件事，可在适当的时候。

那个时候毛泽东也留了一手，当然已经宣布要向苏联靠拢，这个在党内已经讲了，但还是不知道苏联的态度，万一一脚踩空怎么办？要留一手。回去以后，司徒雷登一看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马上告诉白宫让我去北平。去还是不去？美国正好是中期选举，也怕这个事透露出来，做得非常



慎重。司徒雷登发了电报以后就跟黄华讲，去也可以（没有得到批准的时候），我不坐火车去，坐飞机，而且要坐美国航班，你们看怎么办？黄华 28 号把这个电报打过来，结果电报到了周恩来那里，毛泽东已经接到刘少奇的电报，拿到电报一看，又加了一句话，告诉司徒雷登，他爱来不来，来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这个时候是 6 月份，中共就已经回绝了美国，已经宣布向苏联靠拢。但是美国人还是有点想法，他们对言论看得不是很重，看实质问题。所以美国内部还在讨论，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重庆、云南。一直到年底，毛泽东到了莫斯科要跟斯大林谈，但是都没有结果、没有音信。因为毛去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废除 1949 年条约，就要重新签订条约，斯大林不干，不干毛就不走了。所以，所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走了，就毛泽东住在那里不走，他也不出门，一天到晚看电视。所以美国人觉得这又是个机会，29 号最后安全委员会讨论，决定放弃蒋介石。当时美国军人一派意见，美国国务院一派意见，军人主要是军事角度，觉得台湾不能丢，台湾得在美国人的控制下，所以得保护国民党。但是艾奇逊说，不能这么看，关键不是台湾归谁，而是中共跟谁，说美国在亚洲的敌人是苏联，不是中国人，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分裂中苏，让中共靠近美国，或者让他中立。怎么办？很容易，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毛泽东现在最想统一台湾，让他统一就可以了。

这样杜鲁门就在（1950 年）1 月 5 号发表了宣言，1 月 12 号艾奇逊发表讲话，他的讲话和彭斯讲话差不多，说我们对中国人多好，历史上怎么样，我们只有租界地，又没有八国联军，是谁欺负你们？你们 150 万平方公里土地是谁给夺走了？谁在新疆给你们捣乱？谁把外蒙古捣鼓出去的？这就刺激了斯大林，美国的想法想要离间中苏，但是他刺激的是斯大林，斯大林本来不想答应毛泽东这些条件，最后没有办法都答应了。所以签了一个新条约，而且按照中国的要求，1952 年要归还旅顺港，条约签订之日起归还大连港，1952 年还要归还中长铁路，所以中美关系是很有意思的，美国人反而帮了中国的忙。

但是美国帮了中国的忙，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帮了忙以后，这个中苏条约就签了。签了以后美国又变了，本来想拉中国没有拉着，给推出去了。中苏同盟条约一签，美国一看坏了，整个世界格局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共产党的势力在欧洲，现在到了亚洲，而且到了太平洋边上，而且跟美国面对面。所以 1950 年 4 月份美国确定了一个新的战略方针，国家安全委员会 68 号文件确定的，全面围堵。原来在欧洲遏制，现在在亚洲。在这种情况下，从大的格局来看，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共产党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闹事，都是一个危机。其实朝鲜战争是非常偶然的，朝鲜战争、中共打台湾、越南胡志明打法国都一样，美国都会反击，为什么？4 月份已经确定，随后美国顾问回到台湾，这都是在朝鲜战争之前发生的事，如果朝鲜战争不爆发，可能冲突会推迟，但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定了，那就是看社会主义阵营有没有动作？果然有动作，这就是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是一个转折。我们看亚洲冷战，是以热战的面目出现。先是朝鲜战争，后来又是越南战争，又是金门，全是热战。亚洲朝鲜战争的爆发，大的背景是美苏已经全面对抗，但是导火索不是美苏之间的事，而是中苏之间的事。是因为斯大林丢掉了旅顺和大连、中长路以后，又不能不跟中国签订条约协定，所以只能想一个办法，就是既保证跟中国的同盟关系，又能维持住在远东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动港，怎么办？必须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

为什么做这个判断，也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启示。周恩来递给斯大林的方案有一条，前面是讲你要归还什么，最后一条是：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者战争危险，苏联军队可以继续留在旅顺港。1 月 26 号周恩来把这个方案交给苏联人，1 月 28 号苏联回复同意了，这个方案，背景就是刚才说的美国的压力。同时苏联又加了一个补充议定书就一句话：“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险，苏联军队可以沿中长路自由调动”，最后中国同意了。这说明什么，带来的结果是什么？中苏同盟条约按照中国的意见签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远东地区出现了紧张的局面、战争的



局面，我们可以不履行这个协议，苏联还可以继续留在旅顺港、中长路仍然由苏联控制，这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导火索。

1月28号苏联把这个方案交给中国以后的第三天，1月30号斯大林给金日成发了电报，“我同意你的情报，但是这件事，你到莫斯科来我们仔细商量”。在此之前斯大林都不同意，金日成三番五次要开战，要这个要那个，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毛泽东甚至跟斯大林说，把这个小子换了算了。但是30号斯大林就突然改变了主意。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现在来看，朝鲜战争爆发是亚洲冷战的一个标志，其实起因是中苏同盟，如果中国不跟苏联结成同盟，美国的整个亚洲战略不会发生变化。

按照原来的计划，很多人说，是不是美国人也在讨论是不是失去了机会。回过头来说，中共很难做出（决定）要跟美国合作，如果是1944年可以。1944年真有机会，结果美国人没有抓住，“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话都说到家了，跟美国人讲，我们要跟美国学习，别看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现在不搞社会主义。我们所有的政策没有一件是美国企业家不能接受的，我们共产党的目的，跟美国总统林肯一样，就是解放黑奴。当时中国战区蒋介石跟史迪威矛盾特别大，朱德说中国战区特别需要统一智慧，而且最好由美国人指挥，美国一听，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强多了。中国共产党还说希望美国在延安建个使领馆，办签证就方便了。但是这个机会，美国没有抓住。1949年中共已经没得选择。他又不了解，我刚才说的是这些事，档案已经解密了，很清楚，所以历史学家都是事后诸葛亮，他不知道当时这个事情，他知道的就是美国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苏联跟美国势不两立，如果不靠中国共产党何以维持政权。亚洲的冷战，归根到底是因为苏联确定了方针以后，把中间地带——中国、朝鲜都是中间地带——裹胁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使得冷战在全球爆发。

回过头来归纳一下，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冷战主动方面是美国，这个不错。但是苏联很多应对的方略失策，还有当时的状况是因为他没有进入到国际体系。现在中国跟当年苏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中国现在跟美国在一个国际体系下，不管是安全问题、贸易问题、金融、期货等等，所以在一个体系里运作，要想分开谈何容易。斯大林当年跟美国就是谈恋爱，谈两年没有谈成，两个人分手了。现在您跟美国领了结婚证，想离婚，哪那么容易？这房子归谁、汽车归谁？搞不好还有两个孩子呢。真是这样。所以美国人想打中国人一拳，不知道哪一拳会打到自己身上。所以现在中国和美国的状况，要真正进入冷战还有日子，至少要做清楚的切割才行。在这个过程中，也就给中美两国领导人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时间，好好想想是不是真要走到这一步，真到这一步对谁有好处？

谢谢大家。



【论 文】

对“三区革命”的重新认识与评价¹

杨恕、李捷、曹伟²

历史文化是国家认同的核心内容之一，其内容必然也是反分裂斗争的核心内容。历史问题一直是我和新疆分裂主义之间存在一系列争议的领域，争议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维吾尔人的起源，维吾尔人的伊斯兰化和突厥化，维吾尔人的“独立建国”史以及“三区革命”，其中与现实联系最密切的是“三区革命”。在目前反新疆分裂斗争形势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新疆史的表述必须以反分裂为宗旨，必须有利于反分裂，有利于国家认同的建设。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对“三区革命”的一些研究由于缺乏第一手的档案资料以及客观政治环境的限制，因而导致对“三区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存在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的一些情况。近年来，我们从境内外陆续搜集到一些关于“三区革命”的重要历史档案资料，包括苏联的档案，使得我们初步形成了一些对“三区革命”新的认识和看法。

下面，我们从历史事实出发，谈几点“三区革命”的看法，与大家交流探讨。

一、什么是“三区革命”？

长期以来，大陆史学界对“三区革命”的定义是：“1944年秋，新疆伊犁、塔城、阿山三地少数民族人民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盛世才、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争取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的武装斗争。因发生在上述三地区，故新疆各族人民通常称之为‘三区革命’”，且被认为是一次独立的民族解放运动和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种看法既与历史事实不符，也与当时我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相背。

关于反盛世才、反军阀。“三区革命”的开始标志，有人认为从1944年8月的巩哈暴动算起，我们认为真正的起点应该是11月的伊宁暴动，巩哈暴动只不过是伊宁暴动的前奏，旨在转移国民党守军的注意力，实际的目标是伊宁。1944年8月盛世才制造的所谓“黄林案”³的失败标志着国民党已经牢牢掌握了新疆的控制权，且盛世才已于9月被迫离开新疆，新疆不存在典型意义上的军阀，“三区革命”也就没有反军阀的目的。

关于反国民党。“三区革命”发生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中共遵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并没有提出以军事手段打击国民党政府的目标。而且，此时日军正在南方推进一号作战计划，已打到了贵州的独山，抗战正面战场形势危急，中共更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国民党，而是践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之间的民族矛盾，而非广大民众与国民党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在此时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武装斗争有违我党的方针政策。

关于反帝。“三区革命”开始时，正值抗日战争后期，同盟国正在与德、日法西斯进行激烈的战斗，地处新疆西北角的三区（伊犁、塔城、阿山），既远离对德作战的欧洲战场，也远离对日作战的亚洲-太平洋战场，根本不可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此时意大利已经投降，美国、英国是中国的盟国，因此说“三区革命”反帝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在1945年1月“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临时政府发布的九点声明中，也根本没有反帝的内容，给它戴上“反帝”的桂冠背离了历史事实。

¹ 本文刊载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主编《新疆研究通讯》第6期，第1-7页。

²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授。李捷，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师；曹伟，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教师。

³ 1944年8月11日，盛世才制造了逮捕国民党新疆省党部书记长黄如今、建设厅厅长林继庸等人，历史上称为“八一—黄林案”。



二、关于“二次革命”问题及三区与苏联的关系

传统观点认为，“三区革命”的初衷和目的是正确的，但是被民族分裂分子和苏联的干预改变了。1946年6月，三区与新疆省政府达成《和平条款》，阿合买提江等人取代吐烈成为三区新的领导人，同时这被称为“三区革命”的“二次革命”。史学界认为民族分裂分子艾力汗·吐烈窃取了“三区革命”的领导权，并将其引入分裂的歧途，这一说法是错误的。“窃取领导权”是指以不正当或非法手段从当权者手中夺取权力。但问题是，吐烈自“三区革命”一开始就是领导人，此前在苏联指示下成立的“民族解放组织”也是由他担任主席。他的权力是苏联给的，不是从别人手中拿到的，因此，不存在“窃取”的问题。艾力汗·吐烈是苏联的乌兹别克人，有克格勃背景，无论是他任“总统”还是他离任，都是苏联内务部的安排。所以，不存在所谓的“二次革命”。

关于“三区革命”与苏联的关系的定位更有严重问题。传统观点颠倒了苏联和“三区革命”的主从关系，更没有指出苏联对“三区革命”的直接领导作用。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和研究成果都说明，**苏联是“三区革命”的策划者、领导者、组织者，苏联党、政、军各方面人员大量参与了三区的活动，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掌握着干预新疆的最高权力。**根据相关档案，在三区的武装力量民族军中，人数居第二位的是俄罗斯人。中级及以上指挥人员和技术兵种骨干多是苏联红军或内务部的现役人员。最具说服力的是1943年5月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这是一份全面干涉新疆的纲领性文件（全文可见《新疆研究通讯》第5期）。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在其它联共（布）中央关于新疆的决定和苏联领导人签发的文件中看到。苏联制造“三区革命”的目的是恢复它在新疆的影响，使新疆再度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此外，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担任“三区革命”领导人，也是苏联的安排；而放弃“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号、与国民党政府谈判，则是联共（布）中央的决定。

关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前后活动的划界问题。我们认为，如果要划界，应以1945年9月14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为界线。这一决定标志着由于二战结束后的国际局势和苏中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停止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进攻，保持对三区的实际管辖（同时也就保证了在塔城的铀矿开采，苏联当时正在加紧制造原子弹，塔城的铀矿是主要的材料来源），以免由于新疆局势造成中苏对抗而招致美国干预，从而使苏美陷于对抗。

苏联驻华使馆根据联共（布）中央决议向国民党外交部递交的照会（照会文字与联共（布）中央决议基本相同）是在决议的第二天。大致同时，民族军停止了在玛纳斯前线的进攻。吐烈于1946年6月16日才被苏方带走，而民族军在1945年9月已在玛纳斯停止了进攻，也就是说，“三区革命”打击国民党的军事行动所取得的胜利，是在吐烈任“总统”期间获得的（尽管这些胜利与吐烈无关），是在苏联对新疆政策发生改变之前取得的，取得胜利的实际上是苏联。以1946年6月联合政府成立对“三区革命”分期是缺乏历史根据的。改变三区与国民党政权关系的，不是吐烈，也不是阿合买提江，而是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1945年9月之后，民族军人数大幅度削减，大量装备，特别是重装备被苏联撤回，作战能力急剧下降。这一情况，在苏联内务部在新疆的代表叶格纳洛夫少将1946年6月17日给内务部长克鲁格罗夫和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报告及其它资料中都有记述。由于苏联的一系列措施，民族军已不具备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有规模作战的能力。加之苏联政策的转变，1945年9月之后，民族军再没有与国民党军队进行过有一定规模的战斗，也就是说，基本停止了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打击。这是苏联政策的结果，也是基本的历史事实。根据以上，可以明显看出，三区与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斗争，主要是在1945年9月之前进行的。另外一个基本事实是，“三区革命”的“建国”（“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建军

（“民族军”）、建政府都是在初期完成的，分裂也主要表现在 1945 年 9 月之前。也就是说，三区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打击与分裂是同期进行的同一个行动，分裂与反国民党这两个行为是同一个主体。以吐烈离职对“三区革命”分期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需要重视的历史事实是，三区政府成立后，与苏联之间没有设立海关和边防机构，也没有废止盛世才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苏联方面也不允许三区政府过问苏联在塔城等地开采铀矿和其它矿产的情况，三区人员更被严禁进入矿区。三区政府的重要决定，都需经过苏方的同意，这些事实也说明了“三区革命”和苏联之间的主从关系和民族独立的不真实性。《新疆研究通讯》第 5 期已刊发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多份关于新疆的决议，证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际上是苏联一手策划、领导，以实现自己在新疆利益的工具，而不是争取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更不是社会革命。

三、关于“三区革命”的性质

关于三区革命的性质问题，我们提出几点看法：第一，三区政府没有进行土地改革，只是把汉人的土地分给了少数民族农民；第二，没有触及封建势力和宗教上层的利益；第三，没有建立符合民主革命要求的政治-经济制度。将其归入民主革命的范畴是有疑问的。从理论上分析，分裂要反对国民党政权，民主革命也要反对国民党政权，这两种行为有相同的目标，但却有不同的目的。二者是并列的，并不矛盾，也没有因果关系。以“三区革命”反国民党而得出它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而忽视其分裂的目的，显然是不妥的。认为“三区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就不可能承认它的分裂性质；而承认它是分裂政权，哪怕只是指前期，也就无法解释它为什么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称为“三区革命”，并将其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以及“二次革命”说，都否定了苏联的对“三区革命”的领导，否认了它是苏联实现其在新疆利益的工具。回避了这个关键问题，无论做怎样的解释，都不可能避免逻辑错误，不可能符合历史事实。

苏联要利用维吾尔族民族主义达到自己的目的，维吾尔族民族主义需要借苏联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苏联要打击新疆国民党政权以恢复自己的势力范围，维吾尔族民族主义要依靠苏联打击国民党政权以实现“民族自决”（分裂），这两个行为的主体本质上都是苏联，因为只有苏联有力量做到对国民党政权造成实质性的打击。二战期间及前后，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有高度的重叠性。反殖民主义、反封建专制统治两者往往是共生的，因而，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也常由同一个行为体承担。承认“三区革命”是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就很难将其与民族解放分离开来，也就不可能批驳它的分裂本质。新疆分裂主义势力正是利用了这一点，把“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描述成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这也就说明了至今新疆分裂主义势力仍在把“三区革命”作为其分裂思想和行动的动员工具进行大力宣扬、又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的一个原因，而确认苏联的作用和“三区革命”是苏联的工具，就可以清楚解释上述矛盾。

还需要指出的是，从政策上讲，苏联当时并没有打算让三区“独立”，只是以分裂新疆的形式给国民党政权造成压力，以恢复它在新疆的势力和利益。联共（布）中央曾几次做出决定，明确了不向新疆输出革命、不支持新疆穆斯林反抗政府的斗争，即使这种斗争具有亲苏的倾向。对此，“三区革命”的领导成员并不知道，下层民众更不可能了解。苏联的目的只是让新疆的民族主义者成为自己的工具，而不是独立国家的主人。1945 年 9 月 14 日联共（布）中央的决定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披露三区与苏联的关系，可以说明它不是自主的民族独立运动，从而削弱民族分裂的思想、历史基础，这样做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而不这样做，结果则是相反的，现实已经做了最好的说明。



四、关于对“三区革命”领导人的评价

长期以来，对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的评价也很高，认为他们做出了“历史贡献”，对这一评价，我们提出严重质疑，理由如下：

“三区革命”是武装斗争，军事行动无疑是其行动的主体，因此民族军的主要领导人应该属于“三区革命主要领导人”的范围，然而，民族军的主要领导人中，有多个人的特殊性必须考虑。这里举民族军总指挥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的例子。他是苏联的吉尔吉斯人（我国称柯尔克孜人），20世纪20年代后期接受苏联内务部的任务来到新疆。1943年9月，也就是三区革命正在加紧准备的时候，他奉召去莫斯科面见斯大林。1949年8月因飞机失事去世后，斯大林亲笔签署命令给他的妻子和孩子发放特别抚恤金。这在苏联是极少见的，说明了穆努诺夫的特殊身份。他在世时，苏联政府给他的妻子在比什凯克分配了带有土地的独家住宅，并由内务部负责安全。几年前，吉尔吉斯斯坦曾大规模纪念他110周年诞辰，原因是他是吉尔吉斯族的第一位将军。（参见《新疆研究通讯》第5期）对这样一位苏联军人，如果我们给他戴上“历史贡献”的桂冠，显然是不合适的，解放军的开国将军中，也没有几位得到过“做出了历史贡献”这样高的评价。

还需要指出的是，积极与中共联系的三区领导人是阿巴索夫，不是阿合买提江。有俄文文献说，阿合买提江受苏联内务部驻伊宁负责人伊格纳特·斯杰潘科（公开身份是驻伊宁副领事，化名瓦西里·鲍里索夫）领导，他的私人秘书是苏联人娜杰日达·达维多娃，她有苏军的上校军衔。阿合买提江的身份及行为可质疑处很多，有待进一步考察。而值得肯定的是阿巴索夫，他是三区领导人中与中共联系最密切的人，也是三区领导人中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主要人物。

对“三区革命”进行评价，显然要考虑1949年毛泽东的说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当年对“三区革命”的评价是正确的。首先，三区在苏联的指示下，放弃了独立的主张，成为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同盟者，并接受了中共的领导；其次，毛泽东的评价有利于使“三区革命”更为顺利地融入中共的体系；第三，毛泽东当时对苏联在新疆干了什么基本不了解，因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三区革命”对中共严格保密。例如，1949年2月4日米高扬在西柏坡与毛泽东谈话时，就完全否认苏联对三区暴动给予了帮助。尽管如此，毛泽东对三区的评价是有分寸的，看一看毛泽东类似的表态，就很清楚了。另外，我们必须考虑到毛泽东当年做出这样的评价时，并没有考虑到新疆分裂主义之后的发展。在了解了苏联在新疆的做法和新疆分裂势力在20世纪50年代的种种劣迹后，1958年他在成都会议上又讲了苏联在中国搞两个殖民地，一个东北，一个新疆。毛泽东的这一态度，也应该是今天评价“三区革命”时要考虑的一个原则。

综上所述，我们对“三区革命”的基本看法是：1944年11月，苏联为了恢复自己在新疆的影响和利益，利用当地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通过武装斗争的方式，建立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具有分裂性质的地方政权，这个政权是苏联政策的产物，并完全由苏联控制，是苏联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该政权一直存在到1949年新疆和平解放。其间，1945年由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苏联改变了对新疆的政策，推动三区政府参加了新疆联合政府，逐渐停止了对“东突厥斯坦共和国”这一名称的使用。同时，三区部分主要领导人积极与中共联系，接受中共的领导，使三区最终融入了中共领导的民主革命。对于这一政权早期的分裂、反汉行为，责任在于苏联；而各族人民要求民族平等、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愿望是正当的，他们对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做出了贡献。

多年来，新疆分裂势力一直把“三区革命”作为分裂的一面旗帜，鼓吹继承“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民族独立传统。现实告诉我们，不承认“三区革命”的分裂性质，不承认苏联的主导作

用和目的，不否定“三区革命”是一次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就不可能在反分裂理论和政策上有实质性的进步。这不利于对分裂势力的打击，不利于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分裂斗争，不利于对广大群众的教育。

最后强调一点：近年来，分裂主义对国家主权和国际秩序的威胁越来越严重，受分裂主义威胁的国家不断增加，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内的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反分裂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新疆近一时期的工作，对分裂主义进行了有效遏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中，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态度表达了反对分裂主义的决心。这些因素为否定“三区革命”是独立自主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有利的内外环境。应该抓住这一时机，对反新疆分裂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实质性的推进。

【译 文】

1946-1949 年苏联的新疆政策¹

贾米里·哈桑雷著，杨恕编译

按：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外蒙古的利益诉求得到保证后，在苏联干预之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政府代表与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签署和平协议，并于1946年7月正式建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苏联在新疆的权益也得到了保证。但是在麦斯武德被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以及联合政府解散后，苏联重新加大了介入新疆事务的力度。期间，随着中国国内解放战争进程的加速，苏联在得到中国共产党新政府将实行亲苏政策的保证后，促使伊犁、塔城、阿山三区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帮助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对于上述历史，阿塞拜疆学者贾米里·哈桑雷在他的专著《苏联政策中的新疆》中，结合苏联相关档案资料进行了详细研究，现将相关内容编译如下。

一、新疆联合政府运转期间苏联的新疆政策

1946年6月6日，一份由11项条款及两份补充组成的协议《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正式签署。协议的签署以及整个谈判过程都处在三区革命活动负责人叶格纳洛夫将军的监视之下。苏联国家安全部反间谍处处长彼·费多托夫关于叶格纳洛夫给莫洛托夫写道：“1945-1946年间，他领导了伊宁人反对中国的所有军事行动，同样还有与中国人谈判的政治策略”。

协议文本中清楚写到，中国方面不仅不承认“东突厥斯坦”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组织，而且还以协议生效后解散伊犁政府、并在其基础上成立联合政府为目标。尽管协议承认当地民众享有某些民族-文化权利，但没有赋予其地域或者文化方面的自治权。伊宁代表的唯一收获就是根据协议第10条保留了“民族军部队”，但其人数还不能超过1.1-1.2万人。苏联方面清楚地知道，伊

¹ 本文刊载于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主编《新疆研究通讯》第6期，第8-31页。

原著：Джамиль Гасанлы, 2015. *Синьцзян в орбите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Сталин и мусульман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 в Восточном Туркестане (1931-1949)*.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宁政府首脑——艾力汗·吐烈是落实和平协议的最大障碍。因此，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为避免他将来可能采取的某些行动”，6月16日深夜至17日凌晨，吐烈被带入苏联境内。吐烈的助手阿莱丁·阿穆尔及索努尔·穆尼尔（两人在伊宁一直生活到晚年）是这样回忆事件经过的：“7月12日（此处应为6月16日——作者），我们和吐烈一起来到2号房子（苏联在伊宁情报机构的秘密驻地）。房门打开，吐烈由人陪同走了进去。过了一会，门内走出一人让我们离开。我们于是就回来了。此后我们再没见过艾力汗·吐烈，不知道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在6月16深夜-17日凌晨时分，叶格纳洛夫从阿拉木图向苏联内务部长克鲁格罗夫及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报告说，东突厥斯坦政府前任主席艾力汗·吐烈·沙吉尔霍扎耶夫已被带入苏联境内。6月19日，相关部的负责人将该消息报告给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在当天发往内务部及国家安全部的第2份通报中，叶格纳洛夫给这些部的部长们写道，已从新疆撤出早前派去帮助伊宁政府的全体人员，收回了起义军的武器。同时，在叶格纳洛夫和朗方格（苏联国家安全部第一局第4处处长——译者）从新疆发来的一份通报中说：担任新疆新政府副主席一职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此时已来到了伊宁。在民族主义团体看来，哈斯木“在自己政治工作之中只遵循苏联的政治观点”。根据苏联相关机构的安排，他此次前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按照乌鲁木齐协议终止东突厥斯坦政府及整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活动。6月28日，召开了最后一次东突厥斯坦政府会议。在会议上正式宣布停止政府的职权并终结共和国的权力。就这样，中国边疆的东突厥斯坦、尤其是它北部命运之中的一个新阶段开始了。事件后来的发展情况表明，新疆突厥-穆斯林民众成为了莫斯科推行其政策的工具。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克拉西里尼科夫曾公道地指出：总之，新疆民众在苏联领导进行的一场与中国的政治大博弈中，只是一张可以用来交换的牌。

与中国政府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后，苏联就在寻找各种方法以保持自己在新疆的影响。在这方面，莫斯科尤其重视1945年底成立的人民革命党的组织机构的组建，重视增加其大众性。领导该党的是以亲苏著称的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撰写了该党党纲草案并把它发给了莫斯科。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则编订了党纲补充草案，交给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处负责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1946年6月26日，苏斯洛夫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写信说，他已经将尤苏波夫起草的党纲草案与两个强力部门的草案进行了比较，并以尤苏波夫草案为基础对某些条款进行了修正。他写道：“在‘争取政治自由及国家制度’一章中应该说：给予新疆国内自治权并不排除中国对该省的主权权利。如果党纲中不提这一点，那么考虑到过去及当前新疆与中国中央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排除这会成为该党合法地位、登记及活动等问题复杂化的原因”。因此，苏斯洛夫建议党纲上述部分第一条采用以下版本：“赋予新疆省实行民主制度、按各民族人口数量比例选举政权机关的国内自治权”。他主张在党纲结尾部分要展现该党对于对外政策的态度。其中在表述人民革命党对外政策立场时，他所建议的版本是：“本党将拥护中华民国政府的一切进步措施。本党认为必须加强与苏联的睦邻关系、发展经济联系，并与联合国其它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在写给日丹诺夫的信中，苏斯洛夫认为尤苏波夫主张把人民革命党改为新疆人民党的建议是适宜的。在这位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处负责人看来，内务部及国家安全部党纲草案中没有充分考虑新疆当地特点以及该党开展合法活动的条件。他写道：“在某些地方，两个部的草案在向执政党条例方向偏离，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像是一部联共（布）党章（如关于党员责任的条款等等）。乌·尤苏波夫提交的党纲草案则更符合一个初次登上政治舞台的政党的要求”。

在创建政党的同时，苏联机构还注意扩大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新疆的活动，让协会开展新疆民众的工作。从三区革命运动开始一直到1946年3月，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禁止了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活动。该协会1946年的工作报告称，到1946年3月之前，仅在新疆做了极少量



的工作，原因是当时省内政局还十分紧张。中国政府禁止与苏联公民进行任何交流、阅读苏联书籍等。但随着中国中央政府和伊宁代表协商成功，从1946年3月后期开始，由于管制出现一些松动，当地民众有了与苏联人员及机构交往的机会。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新疆开展工作针对的民众主体是当地穆斯林。协会特派员乌尔马索夫经常与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馆协调该协会在新疆省内的活动。就这样，从那时开始，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新疆的活动就不断扩展，不仅覆盖了乌鲁木齐，而且还覆盖了像喀什、伊宁、吐鲁番、托克逊、塔城、额敏、承化（即阿勒泰一译者）等等那些重要的穆斯林居住区。苏联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在新疆的任务是在当地民众、尤其是穆斯林中间，通过发放书籍和报纸，放映电影及举办展览会，提供卫生保健服务等途经扩大苏联的影响。同时，该协会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帮助新疆进步及民主人士与反动分子作斗争，并反对美、英影响向新疆渗透”。

1946年7月1日，按照中国中央政府和伊宁代表6月6日签署的协议，在新疆成立了联合政府。正如预料的那样，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张治中将军被任命为政府主席，而副主席是当地穆斯林人士——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与包尔汉。在此，哈斯木代表的是革命武装力量，而包尔汉代表的则是未参与革命的各界有影响人士。新政府成员应包括15名当地民众代表，其中8位应代表发生革命活动的几个地区。这8位人选实际上都已经征得苏联总领事馆的同意。……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方面加入政府的人员除了阿合买提江及包尔汉两人之外，获得厅长级职位的还有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乌斯满·巴图鲁、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拉西木江·萨比尔霍扎耶夫及赛福鼎·艾则孜。新联合政府第一次会议于1946年7月11日召开，会上通过了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

1946年下半年，处在苏联巨大影响之下的新疆北部三区的领导人，并没有忙于履行6月6日乌鲁木齐协议中那些涉及军事问题的条款。毫无疑问，这种忽视契约责任的态度是那些苏联机关有关指示所造成的结果。这种忽视在张治中将军1946年8月底访问伊宁期间表现得尤其明显。访问期间，张治中看到伊犁地区民族军部队中依然还在大量使用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旗帜，并感受到当地对自己十分冷淡的态度。美国驻南京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的报告中写道，前暴动者……继续在使用自己的“国旗”；在8月底张将军访问伊宁期间，他发现暴动者的那些旗帜要多于中国国旗；一些中国人还感觉到，张也没有享受到新疆省政府主席应有的礼遇。

1947年春，新疆各地蔓延的示威和抗议浪潮开始逐渐演变成反对张治中将军的政府。无论是伊宁代表，还是苏联领导人，都对张将军与阿勒泰义军领导人乌斯满·巴图鲁建立秘密联系并成功使其投向中方的做法感到不满。1946年11月，乌斯满的几支部队开始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在阿勒泰地区的军队发生武装冲突。调查证明，在阿勒泰地区活跃的几支乌斯满部队“经常获得乌鲁木齐中国军队指挥部的支持”。摆脱了苏联影响的乌斯满·巴图鲁已成为苏联在中国西部利益的严重威胁。鉴于此，1947年2月24日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除掉乌斯满及消灭其部队的决定：

“为了阻断阿勒泰地区行政长官乌斯满·巴图鲁·伊斯马伊洛夫针对苏联在新疆利益的敌对活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

1. 责令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其秘密渠道同意新疆民族军司令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中将及阿勒泰地区副行政长官（兼阿勒泰团团团长）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采取的针对乌斯满·巴图鲁匪帮的措施，并建议他们追剿这些匪帮，直至完全击溃和歼灭。

2. 责令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同样渠道建议新疆政府副主席阿合买提江向新疆政府提出将乌斯满·巴图鲁尽快清除出新疆政府并撤消其阿勒泰专区行政长官一职的问题，建议任命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为阿勒泰专区行政长官。将乌斯满·巴图鲁撤职的理由应解释为：他一直躲在自己的过冬地，不愿返回专区中心，没有采取措施维护专区的社会治安和秩序，尤其是没有打击在



其过冬地一带活动的匪帮，没能保护专区民众免受这些匪帮的劫掠。

3. 苏联内务部划拨下列军火供苏联国家安全部调配：(a) 步枪及重机枪子弹 100 万发（俄制）；(b) 轻机枪子弹 10 万发（德制）”。

决定将经过秘密渠道交付军需品的任务委托给了苏联国家安全部。决定中说：“将军火交给新疆方面需秘密安排，此事交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办理”。决定中各项任务的履行由莫洛托夫、阿巴库莫夫及马利克负责，而第 3 条则由克鲁格罗夫负责。

为了向北疆发生的事件提供实际支持并增强穆斯林民众进行斗争的信心，1947 年 2 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朱马拜·沙亚赫麦托夫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议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建立一个维吾尔自治州。他在写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尼古拉·帕托里切夫的信中说：“哈共（布）中央委员会把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内成立维吾尔自治州的问题提交联共（布）中央研究和决定，该州包括塔尔迪库尔干州的潘菲洛夫区和奥科贾布尔区（相当于中国的县——译者）、阿拉木图州的奇利克区、恩别克什哈萨克区、维吾尔区、纳伦科尔区及科根区。成立维吾尔自治州的必要性是出于以下考虑：(a) 在哈萨克斯坦生活的维吾尔人之中，民族团结及发展民族文化的愿望特别强烈。哈萨克斯坦维吾尔人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上述地区他们居住相对集中，同时还保留着自己的民族特点。成立维吾尔州将促进在形式上具有民族特点而在内容上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维吾尔文化积极复兴，选拔维吾尔民族精英进入党政机关，改进维吾尔干部的政治工作，并根除维吾尔民族主义分子在国内外依据臆想的维吾尔民族不平等现象以及停止出版维吾尔报刊、关闭维吾尔学校的所谓论据进行反苏宣传的土壤；(b) 拟设之州各区的经济发展将会更有成效、更为迅速。这一点显得重要还因为，维吾尔州将与新疆伊犁专区接壤，那里是中国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的发源地；(c) 维吾尔州的成立，无疑会引起新疆三百万维吾尔群众的正面反响，使其民族解放运动趋于活跃，同时也会使解放运动更多地以苏联为导向”。

规划纳入自治州的那些地区生活着 2.3 万维吾尔人，在当地总人口中占比超过 20%。沙亚赫麦托夫认为，这个新的州将会变成吸引在哈萨克斯坦以及毗邻共和国境内生活的维吾尔人的中心，短期内该州人数就应会大幅度增加。规划中该州的首府将会是潘菲洛夫市（原热尔肯）。然而莫斯科没有积极接受这个提议。当时认为，无论是在哈萨克、还是乌兹别克、抑或是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成立维吾尔自治州都是不合适的。

二、麦斯武德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后苏联新疆政策的调整

1947年5月19日张治中辞去省政府主席之职，而取代他担任该职的是联合政府成员麦斯武德·沙比尔。张将军在辞去政府首脑职位后被任命为西北行辕主任。新疆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同样也离开了自己的职位，其职务由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担任。然而无论是苏联，还是联合政府中的亲苏成员，都对这些变更感到不满意。尽管张治中将军辞去了政府主席之职，但新疆的事情最终决定权还是在他手中。根据苏联的指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以及政府中来自北部三区的左翼成员起来反对麦斯武德·沙比尔和艾沙·优素福。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三区代表团拜访了张治中，反对以这种方式成立省政府。苏联发动一些地区的旧间谍网筹谋示威游行甚至挑起反对麦斯武德·沙比尔和艾沙·优素福的暴动。一些亲苏人士也开始印刷及散发批判两人的传单。尽管如此，麦斯武德·沙比尔还是开始以政府主席身份工作了，并逐渐罢免了那些在省府机关工作、持左翼思想的亲苏派官员，用民族主义人士取而代之。在麦斯武德·沙比尔掌权之后，苏联与新疆政府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更加冷淡。1947年6月在新疆-蒙古边境北塔山一带发生的武装冲突，不仅使莫斯科与新疆政府、而且还使它与中国



中央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这些冲突描述成乌斯满·巴图鲁（已经受国民党控制）指挥的哈萨克部队6月2日入侵本国领土，蒙古军队经过艰苦战斗于6月5日将其赶出了国界。实际上，所发生之事是苏联意图强化新疆省内紧张局势并恶化与南京政府关系的一次尝试。

在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成立后，苏联对新疆的新一轮政策也开始了。利用以前建立的间谍网，苏联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正在想办法组织穆斯林民众进行反政府的活动。出于这个目的，苏联政府还向哈萨克、乌兹别克及吉尔吉斯三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领导人下达了新的指示。1947年6月29日，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朱·沙亚赫麦托夫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日丹诺夫提出加强在新疆地位的建议。他写道：“为了巩固穆斯林在北疆起义反抗汉人所获得的政治和经济成果，以及该省非汉民众民族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哈共（布）中央委员会认为将如下建议提交给您研究是可行的：在分散的民族复兴团体基础上依靠反汉的那一部分穆斯林群众建立共产党，将其命名为‘新疆人民党’，并采用经联共（布）中央认可的纲领和章程；这个党的日常的、非公开的领导工作由联共（布）中央实行；授权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共产党（布）中央与新疆人民党中央在确定的专区内一起进行相关的工作。作为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授权哈共（布）中央在与哈萨克斯坦领土相接的伊犁、塔城和阿勒泰三个专区进行工作”。

关于成立“新疆人民党”的问题在1946年夏乌鲁木齐协议签署之后就已提出来了。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乌斯曼·尤苏波夫当时就将自己对该问题的建议发给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对外政策处负责人米哈伊尔·苏斯洛夫。朱·沙亚赫麦托夫则就此问题直接呈请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安德烈·日丹诺夫。沙亚赫麦托夫写道：

“我们认为建立一个15个人组成的新疆人民党中央委员会是适宜的，其成员来自新疆非常知名的进步的穆斯林权威人士，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同最近积极参加反汉武装起义的群众联系在一起，并依靠那些已从或正在从各个边境苏维埃共和国派往边界之外的共产党员顾问和教官。并据此原则组建新疆人民党在各个专区的专区委员会：首先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专区，而后再在新疆其它专区”。

沙亚赫麦托夫的大部分建议都与在新疆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有关。其中就有在新疆成立一个青年组织、大规模恢复各种民族文化教育组织活动等等。出于这个目的，朱·沙亚赫麦托夫建议在苏联驻伊犁、塔尔巴哈台及阿勒泰专区中心的领事机构中设二等秘书一职，该职务应派遣哈萨克斯坦外交部有一定领导责任的工作人员担任；在阿拉木图，扩大面向新疆居民的、用维吾尔语印刷的科普、文艺、历史书籍及教科书的出版；安排从莫斯科、喀山、塔什干、阿拉木图方面播放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节目等等其它措施。建议末尾的第20条所列内容为：“为了把新疆的穆斯林吸引到苏联清真寺的爱国宗教发展过程中，并保障有影响的新疆穆斯林宗教人士在我们的国土上与中亚穆斯林宗教领袖的私人交往，应恢复热尔肯城清真寺中的合法礼拜活动（不做硬性要求）”。

沙亚赫麦托夫建议的施行与1946年6月6日中国中央政府和伊宁政府之间在苏联调停下所签署的协议相悖，也意味着苏联在该地区的政策活跃起来，这就使协议的履行受到了威胁。在朱·沙亚赫麦托夫致函日丹诺夫两周之后，194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开始对新疆进行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的秘密决定。根据决定，该广播电台设在塔什干。

塔什干维吾尔语无线电广播一开始工作，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就成了该节目批判的主要对象。在一次播报中就讲道：“以前泛突厥主义的中心是安卡拉，现在它转移到了乌鲁木齐。在以前，像费特·科普柳留、比斯木·阿塔莱依等卖身给英国人，在土耳其发展泛突厥主义和泛图兰主义思想。现在，麦斯武德·沙比尔、艾沙·优素福和那些卖身于帝国主义者朋友们，开始在东突厥斯坦宣扬这些思潮”。这些节目公开表示了莫斯科对新疆省政府的不满。



苏联在 1947 年下半年决定重新积极实施自己在新疆的政策。为获取有关东突厥斯坦地区局势的详细情报并制订针对该省的新政治路线，1947 年夏，苏联领导人召乌鲁木齐总领事亚历山大·萨维列也夫回莫斯科。得知他要返回莫斯科的消息后，新疆政府前领导人张治中将军给总领事发了一封长信。在收到张治中将军信函的 5 天之后，7 月 12 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拉西木江·萨比尔霍扎耶夫也给苏联总领事亚·萨维列也夫寄来一封长达 4 页的信。由于伊宁领导人在发给苏联总领事的信中表达了不满，民众中开始蔓延一些谣言，称伊犁人士和苏联之间关系似乎已经恶化了。1947 年 8 月 19 日，张治中与哈斯木及阿合买提江等的信件从汉语及维吾尔语翻译过来之后，与同时发出的一份文件由苏联外交部远东一处副处长 T·斯克沃尔措夫寄给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情报处负责人 Л.巴拉诺夫。

鉴于新疆问题重新列上了议事日程，苏联也开始讨论进行与新疆相关的科学研究以及在苏联科学院一家研究所中设立相应部门的必要性问题。讨论期间，曾就设立研究当代东方及进行新疆问题研究的新研究所问题起草并发送了一份报告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动员和宣传局。报告指出：“新疆政局恶化以及当地生活的诸民族——维吾尔人、哈萨克、吉尔吉斯人和卡尔梅克人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要求我们仔细关注并深入研究所发生的各种事件”。报告拟订要研究东突厥斯坦的历史、经济、地理问题，并建议在以下方面开展这些工作：

1. 新疆的自然地理特点，将新疆作为一个与苏联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统一的地理整体的组成部分；
2. 与中亚地区诸民族族源相关的新疆各民族族源问题，以及解决新疆民族问题的途径；
3. 新疆历史及当地民族解放斗争情况，将其作为提高本土各民族爱国情感的源泉；
4. 新疆各民族民族文化问题，如语言，文学，民间口头创作，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等；
5. 新疆宗教问题以及利用该问题的机会；
6. 新疆经济，计划披露新疆的殖民地处境，封建残余统治情况以及借助发展与苏联经济的关系以实现崛起的前景。

鉴于双方关系已十分紧张，1947 年 8 月 26 日，伊宁代表宣布退出政府。8 月 29 日，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拉西木江·萨比尔霍扎耶夫及其他来自伊犁地区的代表团成员乘飞机离开乌鲁木齐，回到了伊宁。紧随他们之后，那些协商委员会成员也离开了乌鲁木齐。由于北部地区代表的这种行动，莫斯科也就失去了对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的影响。因此，为了使新疆回到自己势力范围之下，苏联开始筹谋新一阶段的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就在 8 月 29 日这一天，政治局根据莫洛托夫的建议通过了“批准苏联部长会议所属情报委员会关于授予其正式名称——苏联部长会议所属经济研究委员会的提议”的决定。新成立的委员会所研究的第一个问题是就新疆问题起草建议并将其提交政治局审定。在 9 月 10 日提交讨论的那些建议之中讲道：“为了防止新疆穆斯林民族解放运动被打垮并巩固穆斯林在反对中国的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经济研究委员会认为必须采取下列措施：建议代表穆斯林的新疆政府成员——即从乌鲁木齐回到伊宁的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包尔汉、拉西木江·萨比尔霍扎耶夫、赛福鼎·艾则孜、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等人，致函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将军和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1946 年谈判调停者），应在信中指出，他们离开乌鲁木齐是因为中国反动势力的猖獗，中国官员直接违反了 6 月 6 日协议条款以及当前令人难以忍受的政府中的情况”。

建议还指出，必须要提出这样的一些要求：尽快释放被捕的穆斯林人士；惩治在这方面以及在迫害进步人士方面有严重过错的汉人；麦斯武德·沙比尔辞去省政府主席之职；履行 6 月 6 日协议的所有条款。苏联领导人认为，在写给张治中将军及苏联总领事亚·萨维列也夫的信中应强调，如果履行这些要求，写信人就准备立刻返回乌鲁木齐并继续在张治中领导下在政府中工作。经济研究委员会建议政治局：“以‘为实现 1946 年 6 月 6 日协议而斗争’的口号，使乌鲁木齐



地区的吐鲁番绿洲已开始的穆斯林游击队反中国运动进一步活跃起来，同时在 1944-1946 年反中国起义大多数参与者生活的新疆南部地区（阿克苏、库车及喀什地区）安排部署游击运动”。

建议主张公开宣布新疆南部发动反中国斗争的主要理由是中国政府在喀什大规模逮捕当地穆斯林，以及中国政府日益蛮横专断地对待当地民众。经济研究委员会还确定了新疆南部游击运动的领导人。建议中讲道：“为了领导新疆南部的游击运动，应将目前暂时生活在乌兹别克及塔吉克共和国境内、前起义运动的那些领导人（如塔基穆拉耶夫·卡拉万绍-别克、塔基穆拉耶夫·阿丘尔-别克、米尔扎·阿赫迈多夫·塔依尔-别克、阿不都克里莫夫·穆赫塔尔等）秘密派往那里。应向新疆游击队提供武器和弹药援助，将这些东西从苏联境内秘密地调拨过去”。建议第 3 条谈的是尽快对 1.2 万前东突厥斯坦军队提供武器及技术装备的问题；第 4 条则希望成立一个组织来领导新疆的民族解放运动。建议中写道：“建议新疆穆斯林进步运动领导人成立一个总部设在伊宁的‘新疆和平促进协会’，该协会应在为实现 1946 年 6 月 6 日协议而斗争的口号下开展工作”。同时应事实上负责新疆境内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计划将来一有合适机会就将协会变成一个合法政党，由政党领导民族解放运动，指导每一斗争阶段的工作。与此同时，建议还认为应当建立该协会的各专区、县的机构，将进步穆斯林人士、宗教界代表、部落长老等等吸纳到其阵营之中。

在经济研究委员会这些建议的基础上并考虑到当前的局势，1947 年 9 月 10 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份“关于新疆”的决议，由 6 条内容组成。决议中说：“责成苏联内务部（克鲁格罗夫同志）：（a）调拨以下数量的俄式（老式）以及缴自德军的武器和弹药供经济研究委员会安排：步枪 9000 支，重机枪 70 挺，轻机枪 300 挺，连用迫击炮（即 60 迫击炮——译者）40 门，反坦克枪 40 支，手榴弹 18000 枚，步枪子弹 800 万发，连用迫击炮弹 15000 发，反坦克枪子弹 15000 发。武器和弹药应运送到委员会所指定的地点；（b）命令边境机构无阻碍地放行持有委员会通知单的人员和物资；（c）在必要情况下，为委员会安排边境飞行中队的飞机用于其苏联境内的飞行”。根据决议第 3 条，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受命向经济研究委员会调拨汽车运输所需零件；零件运送由苏联内务部负责。政治局决定特别提到：“责成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及塔吉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在经济研究委员会就新疆实行所拟定措施期间向其提供必要的协助”。

决议还建议：“武器不应立刻交付，而是根据需要以及马利克同志与费多托夫同志的协商情况办理”。决议把组织管理及政治措施的执行交由土库曼斯坦内务部长弗拉基米尔·叶格纳洛夫负责，此人是第一阶段新疆事件——即新疆北部革命运动的主要组织者。他作为人选是由苏联部长会议情报委员会副主任彼得·费多托夫在给莫洛托夫的一封电报中提出来的。该电报写道：“遵照您的指示，我与克鲁格罗夫同志及奥戈尔措夫同志讨论了派谁去新疆开展组织管理-政治活动的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推荐候选人叶格纳洛夫·弗拉基米尔·斯捷潘诺维奇少将请您审核……。目前叶格纳洛夫是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内务部长。叶格纳洛夫的副手，我们认为应调派奇巴耶夫·彼得·安德烈耶维奇上校担任，由他负责与我国驻新疆情报机关的联络工作。安德烈耶维奇是国家安全部远东情报处前任处长，也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情报人员，参与了 1945-1946 年间在新疆的诸多行动，目前在我委员会负责新疆事务”。为了在新疆组织新的游击运动及开展政治活动，费多托夫认为应当征求乌兹别克斯坦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意见，派遣干练的国家安全机构人员进入新疆。他给莫洛托夫写道：“为了确保政治工作在伊宁的开展，宜调派一位乌孜别克族的相关人员。如果您对此表示同意，请允许我与乌斯曼·尤苏波夫联系，和他商讨如何调派此人的问题。我们将挑选 15-20 名干练的工作人员供上述同志调遣，可将工作人员派到新疆境内，假扮当地人秘密执行调运武器任务，监督武器为我方利益服务的情况并通过我方在伊宁人中的代理人员解决其它各种问题”。



政治局依据经济研究委员会建议于1947年9月10日通过的秘密决议，制订了落实决议的组织管理-政治措施，确定了执行党的决定的主要机关，批准了协调这场民族解放斗争名义之下的分裂运动的领导干部人选，以及派遣苏联国家安全机构别动队前往东突厥斯坦各个地区……。所有这些做法标志着政治局1943年5月4日关于在东突厥斯坦部署分裂运动的决议在新的政治局势下又回归日程。苏联为发起新一波分裂运动制造各种条件，使中国中央政府面临新一轮的“神经战”。但是，无论是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建议，还是政治局通过的秘密决定，都再没有出现恢复东突厥斯坦国、使用其标志符号的提法。该地区管理是由联合政府中伊宁代表所成立的组织——“新疆和平促进会”（疑为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1948年8月成立，阿合买提江任主席——译者）来实施的。经济研究委员会起草建议，政治局通过新疆问题秘密决定，中国共产党与中央政府谈判中断，新疆事件在时间上刚好赶上新一阶段国内战争的开始，这些事情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现象。

然而，与1944-1946年间时期不同的是，新疆北部地区在1947年秋还没有实现统一。乌斯满及其哈萨克战士此时已成为令各苏联机构人员头疼的新问题。尽管苏联领导机构在1947年2月就下达了清除乌斯满及歼灭其所率部队的命令，但乌斯满却为恢复自己对阿勒泰地区的控制展开了更为积极的行动。虽然对“新疆锡业”及其它企业构成了威胁，“苏联内务部依然还是命令机动支队（即部署在伊宁及可可托海的内务部边防军机动支队——作者）队长加强对可可托海勘察队基地的保护和防卫，不要参与乌斯满和民族军队的作战行动”。1947年9月，乌斯满的部队（1500人）及卡里别克的部队（900人）对阿勒泰地区发动突袭。乌斯满突然占领可可托海（9月3日）及阿勒泰首府承化（9月12日），迫使负责执行政治局决定的阿勒泰地区领导人达列里汗从城中逃了出来。负责新疆政局事务的苏方工作人员认为这些军事行动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中国新疆省政府在人员、武器、装备及粮食方面向乌斯满提供了帮助。这些帮助主要与新疆国民党军队司令宋希濂将军有关。

然而乌斯满品尝胜利果实的时间却并不长。9月底，达列里汗来到塔城，要求增加援助以与乌斯满部队作战，塔尔巴哈台地区也开始征召志愿兵，配发武器并交由达列里汗指挥的两个骑兵连以及几个步兵营。除此之外，根据莫斯科下达的指示，加入清除阿勒泰及塔尔巴哈台地区乌斯满部队行动的还有苏军的几支部队。10月16日，约100辆卡车运载着3000多名重装士兵，由6辆坦克协同驶入阿山北部地区。除了苏联，伊犁部队并没有其它获取军事装备的渠道，尤其是坦克，目前拥有的那些坦克并不能说是他们在起义期间从政府部队手中夺取的，因为政府军那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塔尔巴哈台专区政府的常备部队和新成立的部队以及苏军一起发起进攻，在10月下半月夺回了对承化的控制。乌斯满部队则撤退到山里。美国领事认为，伊犁民族军的此次胜利没有苏联的帮助是不可能的。宋希濂将军在与包懋勋的交谈中公开声称：尽管可能有红军部队，但这些武装进入这个地区主要是为了驱逐哈萨克部队并收回对富蕴（即可可托海——作者）钨矿的控制。但是，苏联欲借助蒙古国除去乌斯满的计划最终却没能成功。

在将乌斯满武装部队从矿产资源丰富的阿勒泰及塔尔巴哈台地区驱离之后，新疆北部地区的苏联内务部队及国家安全部别动队也回到了自己的防御阵地。在此期间，为确保三个革命专区的“安全”，苏联认为必须加强伊宁民族军的人员组成并巩固其物资设备基础。在苏联顾问看来，根据1946年6月6日协议改组成立的1.1-1.2万人的民族军部队应当维护三区的安全，使之免受乌鲁木齐方面的侵犯。鉴于乌斯满的军事威胁已降到最低限度，1948年2月14日，弗拉基米尔·叶格纳洛夫给苏联内务部长C·克鲁格罗夫发去一份“关于将其所率领的内务部人员召回常驻服务地”的电报。为获得上级领导机关的指示，克鲁格罗夫于1948年2月18日将此电报转给了莫洛托夫。苏联领导人同意了叶格纳洛夫的建议，并从1948年春开始主要关注整体加强北部专区的军队以及当地政权机关的问题。



三、苏联帮助中国共产党接管新疆

从 1948 年开始，苏联顾问们计划逐步将始于伊犁地区的当地民众民族解放运动融入全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之中。在中华民国中央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终止之后，中国国内战争进一步趋于激化，在此期间，蒋介石已失去了对国内一些重要地区的控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很快开始的决战阶段也波及到了新疆。听命于中国中央政府的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在遭遇莫斯科及其控制的“民族力量”巨大压力之后，开始实施更激进的反苏政策。因新疆省政府认为“所有祸害”都“源于俄罗斯”，所以它发起成立了一个名为“反苏、反共、反三区革命委员会”的社会组织。在该组织之下还组建了一些军事化的青年团体。由于这些团体主要由哈萨克族青年人组成，这些团体的领导权就交给了乌斯满。一场残酷打击乌鲁木齐及其它政府控制地区内苏联代理人的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在中国国内以及新疆边境地区局势均日趋紧张之际，对北部三区的管理不可能长期处于不确定的状态。考虑到这种情况，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于 1948 年 4 月 24 日通过了“关于加强伊犁、塔尔巴哈台及阿勒泰三专区政治经济状况的有关措施”的决定。决定中说：“为了加强行政及军事管理并改进新疆伊犁、塔尔巴哈台及阿勒泰地区政治经济状况，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建议哈斯木·阿合买提江（新疆政府副主席）在伊宁召集三区各地正、副行政长官及财政、经济机构领导人开会商讨当前的形势。此次会议上应成立一个由 5-7 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作为负责整个三区行政管理及经济事务的领导机关，但该委员会不要公开走向前台。为了不让中国政府方面知道该机构的真正使命，应将其称作‘财政及经济状况研究及改良委员会’”。决议写道，如果中国政府方面质疑成立该委员会的原因，应答复：“委员会的任务就是制订措施征收维护部队及行政管理机构所必要的货币和物质资料，并对此进行监督，因为中国政府迄今没有划拨这些资料，而此种做法已违反了 1946 年 6 月 6 日协议的相关条款”。这份文件建议赋予委员会对三区政治及经济生活进行监督的权力，其中特别讲道：“赋予委员会监督行政管理机构政治及经济活动的权力，并有权就这些问题下达整个三区都必须遵守的、非公开的指示”。

苏联领导机构建议从新疆民族解放运动拥护者中选出可靠的人来组建委员会，与此同时却认为不宜将伊犁地区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与伊宁武装部队司令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吸纳进委员会。莫斯科方面认为，只需始终把这两个人视为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即可，不必在委员会之内担任任何正式职位。委员会在三区境内的工作应当包括：制订统一的财政及实物税制度；监管比新疆其它地区更低的税收水平；确保军队、国家机构、教育及卫生部门所用物质资源的征收；筹划整个三区 1948 年的预算；为军队及国家机构拟订人员编制、明确工资标准等等。由于这些措施的施行，1948 年原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境内市场上的物价只是新疆其它地区物价的五分之一到十二分之一。

决议规定要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以该同盟名义发布一份“告全省人民书”，并确定拟提交苏联政治局批准的呼吁书文本。苏联领导人认为应该让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及伊·穆努诺夫负责该同盟的领导工作。政治局决议第 3 条说：“要用当地工作人员的力量肃清在三区活动的乌斯满分子及中国政府代理人。为了动员人们积极与乌斯满分子及中国政府代理人做斗争，应在各地行政主管部门之下设立‘强化法治和秩序委员会’，吸收最可靠的氏族长老及宗教界人士加入此会。这些委员会的职责是听取各类拘押案件的调查结果并根据结果做出决定，随后再由行政长官对决议予以审核”。苏联政治局这份决议的第 4 和第 5 条则与工业及经济问题相关。根据这些条款的内容，苏联认为有必要在伊宁成立一家“伊犁工贸股份公司”，赋予该公司在开展内、外贸易活动方面的特权，在该公司之内组建各类合作组织，吸纳可靠的人加入公司，其中 1 名或



2名是苏联专门为该公司派遣的人员。为此，苏联外贸部部长阿·米高扬得到命令，在1948年9月1日前向“伊犁工贸股份公司”调拨小型石油工厂设备、电话电报及医用器械、药品，条件是以此交换价值150万卢布的原料、畜牧产品以及其它资料。决议最后一条责令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尤苏波夫及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紧急找出那些来自新疆、已落户于共和国境内并受过教育的维吾尔人、乌兹别克人及柯尔克孜人，以便让他们回到新疆加强三区的行政管理机构。将其中最具有学识及最合格的人员，经过与费·弗·库兹涅佐夫（费多尔·库兹涅佐夫，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下设的情报委员会副主任——作者）协商，派到新疆去工作。乌兹别克斯坦及哈萨克斯坦国内的学校，为那些在苏联求学的新疆青年开设专门的班级，培养医生、教师、农艺师、行政管理人员以及其它专业的骨干，以便将来在新疆工作之用”。

这份斯大林所签发决议的执行事宜，由莫洛托夫、库兹涅佐夫、米高扬、尤苏波夫及沙亚赫麦托夫负责。与该决议一起，政治局还通过了4页内容的《告全省人民书》文本。这份呼吁书说：新疆各穆斯林民族长期遭受压迫和剥削，解救他们需要全体民众的团结和友谊，保持1944-1946年革命的成果；事实已多次证明，必须捍卫1946年协议中的民主条款。呼吁书还特别提到：“但目前依然还是敌视人民的那些分子在掌权，这些人想剥夺人民历尽艰辛得到、并被中华民国政府承认的自由。在一些掌权人物的支持下，草原恶狼乌斯满及其强盗匪帮曾经干过且现在仍在继续的那些突袭抢劫、对和平民众的暴行、对妇女儿童杀害、横行霸道及恣意妄为等等，就说明了这一点。新疆人民不会忘记卡里别克方面背叛人民事业的行为，他是乌斯满的同伙，也是如乌斯满本人一样的暴徒”。为了建立新疆各民族之间的友谊，建设一个各民族自由友好的社会，呼吁书宣布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呼吁书结尾称：“‘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依靠当地人民支持、履行人民意志，肩负着为人民解决这些重大问题的伟大而神圣的使命。‘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将尽一切努力支持中华民国政府所有进步的、真正民主的措施……。全省各专区、县、乡、村也将组建成立具有同样任务的地方同盟组织”。所有人，无论其性别、民族、信仰、职业及社会地位，都可被吸收为同盟成员。

1948年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工作开始具体付诸施行，政治局根据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建议于4月24日所通过的决议认为，成立该组织是极其必要的。同年7月，根据人民革命党、革命青年联盟、自由协会及其它社会组织的提议，在伊宁召开了各民主力量、团体及协会的代表大会。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会上做了“关于中国当前政局及各民主组织和团体任务”的长篇报告。而后，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成立“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的决议。该组织中央委员会由阿合买提江·哈斯木领导，成员包括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萨格杜拉·赛甫拉也夫等等其他人。代表大会发表了“告全省人民书”，其文本已在4月24日由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进行了审核。发表之时，文本中与新疆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等方面有关的12条内容均未做任何变动。该呼吁书中的主张有：言论、出版、集会及宗教信仰自由；各民族权利平等；以选举的方式组成地方机构，并吸收广受当地民众信赖的人士加入其中；人民对行政机构的工作进行监督；成立人民教育协会；确保书籍印刷、期刊出版使用民族语言；开设用母语进行教学的小学、中学及职业技术学校；诉讼程序采用民族语言；消除性别歧视；扩大医疗机构网络；向贫穷民众阶层提供免费医疗服务；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改进农业土地的使用；发展畜牧业，改良土壤；扩大牧场用地以及解决其它问题等。

由于同盟是按苏联计划成立起来的，驻新疆苏联机构也就积极参与了其创建工作。它们的参与促进了同盟在极短时间内实现了大众化。仅一年之后，同盟在伊犁、塔城及阿勒泰三个专区就联合了27个县级和755个基层组织，成员超过了5万人。同盟领导人阿合买提江·哈斯木在当时的公开演讲、文章及信件中坦率表达了在给予最大限度自治权的条件下继续让新疆成为新中国

一部分的想法。

1948年12月，苏联外贸部部长阿·米高扬，根据政治局4月24日的决议，就苏联与新疆贸易的主要方向表述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并将它报给了斯大林。他写道：“今年11月底，一些著名的乌鲁木齐商人多次来找我国贸易代表机构，要求向苏联出售毛料、生丝、皮料、皮货以换取苏联的商品，同时这些人还说，他们能够获得新疆省政府对苏贸易的许可。中国人对与我国贸易如此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目前在他们控制的新疆地区正在遭受严重的经济困难。因此可以预期，他们一定会向我们做出让步，而我们则以我方能够接受的条件为基础，协商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米高扬认为：“……继续推迟就谈判问题做出决定是不应该的，因为继续拖延下去未必会对我国有利。贸易和经济合作的恢复将进一步促进和巩固我国在新疆的地位，使我国与新疆民众的边境贸易以及苏联冶金工业部在新疆伊犁和阿勒泰边境地区进行的稀有金属开采活动合法化”。他说，与新疆经济关系的基础不仅仅是石油、锡和钨矿，而且还有稀有金属。部长认为，所有在新疆开采的有色及稀有金属，除了留下满足当地需求的必要数量之外，都应运到苏联境内。因此，米高扬建议立即开始与新疆省政府的谈判，谈判工作交由乌鲁木齐苏联总领事亚·萨维列也夫及苏联驻新疆贸易代表A.伊弗钦科夫负责。然而一些苏联机构，尤其是苏联外交部，却认为现在开始与新疆政府就恢复经贸关系问题进行谈判是不适宜的。比如，外交部远东一处处长尼·费多连科在向副部长安·葛罗米柯报告时写道：“当前中国国内政局对国民党极为不利，不适合我方在新疆经贸合作谈判问题上采取主动。若这样做的话，可能就会被视作对南京政府在政治上的支持”。

莫斯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从1948年年底开始走向公开化，而它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施压则进一步加强。这些施压手段之中有一些就直接与新疆有关。曾试图调解共产党和国民党避免发生内战的张治中将军，此时继续以省的行政领导人及西北地区中国武装部队指挥部总司令官（张治中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译者）的身份控制着新疆。共产党对他态度不坏，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甚至“称他为自己的朋友”。他密切关注着中国国内的军事、政治发展进程，目睹获得苏联支持的共产党所取得的优势，也想在新的政治情况下抓住机会保持对新疆局势的影响力。

此时，对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不满的苏联代表，秘密派遣前联合政府成员、“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领导机构成员包尔汉前往张将军的指挥部。包尔汉对将军说：中国共产党的士兵正在向中国西北地区推进。如果他能为防止该地区被占领而断绝与中国国民党方面的联系，而且与中国共产党就不派部队进入东突厥斯坦地区达成协议，那么苏联将提供大量军事与经济援助来加强该地区共产党的地位并支持其独立状态。在这一问题上，包尔汉建议张将军首先“解除麦斯武德·沙比尔、秘书长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的职务，并召回指挥在东突厥斯坦的国民军司令宋希濂”。时任麦斯武德·沙比尔政府秘书长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回忆说，张将军与苏联驻南京大使甚至就此问题达成了一些秘密协议。根据这些协议条款，苏联保证帮助中国西北地区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提供经济援助，帮助培养干部，建设空军，发展通讯，促进农业及加工业，并承诺在必要时派遣相应数量的部队进入该地区。在动身往南京之前，张将军向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通报了自己对替换新疆政府主席的看法。在乌鲁木齐领事区为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一份报告中讲道：“在去南京之前，张治中对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萨维列也夫同志说，他准备撤消麦斯武德主席之职并委派深得伊宁人信任、同时又与汉人保持密切关系的包尔汉来担任该职”。这样，根据协商结果，张治中将军在1948年年底和蒋介石见了面并对他说：“我们作为中国民族主义者，不得不投入全部精力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生死之战，而俄国人利用这个机会，还可能会在伊犁暴动分子的帮助下占领其他专区。为了防止俄国可能占领新疆，应从新疆召回以反俄倾向而著称的部队司令宋希濂将军，并委派性格较温和的陶峙岳取代其职。更符合我国民族利益的还有任命包尔汉来替换麦斯武德·沙比尔，并让刘孟纯回来取代艾沙·优素福之职”。



此时本来就处境困难的蒋介石，也正在寻求与苏联改善关系的机会。因此，张将军的建议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中国政府首先在 1948 年 12 月批准了将宋希濂从新疆军队司令职位上召回的命令，任命陶峙岳将军代替其职。陶将军千方百计想办法展现自己对苏联的友好态度。而后他会见了省政府主席麦斯武德·沙比尔并对他说，为防止苏联占领该省，中央政府似乎要将他以及几名政府成员撤换下来。1949 年 1 月 10 日，即蒋介石向苏联提出在与共产党谈判中担任调停人的请求 2 天之后，陶将军解除了麦斯武德·沙比尔的省政府主席职务。与此同时，麦斯武德·沙比尔拒绝了南京政府任命他为中国驻伊朗大使的建议。以亲苏倾向而著称的包尔汉被任命为政府主席。任命他为政府主席让苏联驻新疆机构以及莫斯科的苏联领导人非常满意。包尔汉支持以自治为条件将新疆留在中国版图之内。由此可见，这次任命标志着莫斯科支持的伊宁集团掌握了新疆的政权。

在收到南京政府有关调停问题的提议之后，同时根据苏联外交部提交的报告，政治局在 1949 年 1 月 14 日的会议上讨论了中国国内局势。会议以“绝密”方式批准了斯大林发给毛泽东的密电。鉴于毛泽东正准备前来莫斯科，斯大林在这封电报中建议毛泽东推迟此行，由自己派遣一位政治局成员前往中国。1 月 17 日莫斯科收到毛泽东的回电。在电报中，毛泽东同意斯大林有关暂时推迟访问莫斯科的意见，并对派遣一位政治局成员到中国的想法表示欢迎。关于见面地点，毛泽东说：“最适合政治局成员前来的地方是石家庄。这个地方相对封闭，而且从这里可以直接前往我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在获悉毛泽东的回电之后，斯大林将中国之行的秘密任务交给了阿·米高扬，但这件事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因此，米高扬于 1 月 26 日离开莫斯科来到远东地区“了解千岛群岛及勘察加半岛的渔业情况”。1 月 30 日，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此次会谈讨论的问题有：“中国军事形势”，“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错误的态度”，“中国共产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等等。

首次谈论有关中国穆斯林的问题，是在 2 月 1 日米高扬与周恩来会谈的时候。对米高扬有关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会不会提某些要求这一问题，周恩来回答说：“穆斯林民众想获得的是自治权。如果我们给予他们自治权并小心处理其宗教问题，他们会和我们合作的”。米高扬问中国西北地区穆斯林的情况如何，周恩来指出：“中国这个地区有许多不同的、还处在落后发展水平的少数民族，其中仅有一些人达到较高社会层次”。有关新疆的问题在 2 月 4 日政治局代表与毛泽东会谈期间才充分得到了讨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回答米高扬问题的时候，阐述了自己的民族问题观点。在关于此次会谈的报告中，米高扬写道：“我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上不要用给予少数民族独立的方式而过分表现自己，这会造成在共产党人掌权时减少中国的领土。给少数民族的应该是自治权，而不是独立。毛泽东对此建议感到高兴，从他面部表情来看，他是不打算让任何人独立的”。随后，就在这一天，双方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了新疆问题。米高扬在 1960 年 9 月 22 日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撰写了一份关于他 1949 年 1-2 月中国之行的详细报告，其中是这样描述中共领导人对新疆问题表现出的兴趣的：“毛泽东怀疑我们在新疆的意图。他说在新疆伊犁地区有不服从乌鲁木齐政府的独立运动，但同时那里也有共产党。他讲道，1945 年在重庆与白崇禧会见时，白崇禧告诉他，伊犁地区的暴民拥有苏联生产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我明确向毛泽东声明，我们不支持新疆民族的独立运动，不但如此，我们对新疆领土也没有任何野心，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当然，米高扬是以苏联领导人特有的自信在这样的场合说假话。要知道，他不仅参加了制定了关于新疆的秘密决议的所有那些政治局会议，而且还是这些决议一些条款的执行者。在与毛泽东会谈期间，米高扬指出：“这场运动是中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引起的，政府不愿考虑那些民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的权力，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如果能给新疆各民族自治权，那么未必会有独立运动的温床……。我们一直支持发展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及贸易，正如现在发生的那样，正如以新疆张



治中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所主张签署的协议那样”。就此问题，毛泽东强调：“他们的意思是使新疆整体自治，就像内蒙古一样，它已经是一个自治区了”。

与米高扬交谈期间，毛泽东对新疆石油储量的多少特别感兴趣。为了满足其兴趣，米高扬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并加工了大量的石油，由于没有输出的交通工具，这些石油都用于满足新疆省内的需要”。另外一个让毛泽东感兴趣的涉及新疆的问题是，能否实现在东突厥斯坦境内将中国铁路与苏联铁路连结起来的想法。毛泽东将这条铁路视为具有军事战略意义的交通线。因此，毛泽东问道：“能否修建一条铁路将中国铁路与苏联铁路通过新疆连结起来？如果爆发新战争，这将对两国国防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样的战争中，中国当然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地区遭遇军事威胁，这条铁路就将是中國作战部队的一条重要补给通道”。但米高扬却不能给予毛泽东任何答复，因为他不知道斯大林对此问题的看法。2月5日，他给斯大林发电报报告了这一问题。米高扬从中国返回之后，斯大林才在讨论他此次中国之行成果时表示，连结苏中两国的铁路更适合经过蒙古修建。鉴于此，政治局代表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去信写道：“……应经过蒙古国修建铁路，因为这里已经是一个人民共和国，且这样修铁路会更短、更便宜，而修建新疆铁路则是摆在第二位的”。

2月6日，在毛泽东与米高扬又一次会谈的时候，中国穆斯林地位问题再次成为讨论的话题。毛泽东说：“我们承认穆斯林的民族地位，我们从来不赞同国民党压迫中国穆斯林民众的政策，因此也认为应给予他们中国国内的自治权，中国目前共有多达3000万的穆斯林民众”。在此次交谈期间，中国共产党首脑简要阐述了自己针对新疆的规划。他指出：“新疆生活着14个民族，人口总数约300万。新疆具有巨大战略意义，并在经济上将我国与苏联联系在一起。根据我方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入新疆”。但斯大林却不同意毛泽东按照其在中国推进共产主义的方案，打算在1951年才进入新疆的计划，他在1949年6月就必须加快在新疆建立共产党体制一事给中共领导人发去一封专电。苏联领导人在这封电报中写道：“我方建议必须对新疆予以重视，这里地下蕴藏着石油，在这里您也能得到棉花。您没有石油将会十分艰难。如果能尽快开始在新疆的工作，那么经过2-3年就能拥有自己的石油。将来可以从石油开采及加工地区铺设输油管到郑州车站，而从郑州您既可以走水路、也可以走铁路将石油运往国内各地。因此，您不宜长时间推迟占领新疆”。

当斯大林于1949年6月在莫斯科接见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时，他再次谈到了这个问题。会见中国共产党人时，斯大林提到新疆在经济及战略上对新生政权的重要性问题。他这样向中方代表团建议说：“占领新疆一事不应再拖延，因为拖延会招致英国人对新疆事务的干预。英国人可能将穆斯林挑动起来，其中也包括印度的穆斯林，使针对共产党的内战继续下去，这是不希望发生的。另外新疆还有丰富的石油矿藏和棉花，这是中国急需的”。中国共产党认为斯大林之所以坚持要尽快占领新疆，是因为他对泛伊斯兰主义可能在中东地区蔓延感到担忧。人口主要为穆斯林的巴基斯坦在1947年8月的建立进一步加大了这种可能性。苏联领导人——首先是斯大林——普遍认为：一个新穆斯林国家在中东出现是由于英国加强了阴谋的实施。在斯大林看来，英国人可能会将这些做法也用于东突厥斯坦。为了排除这种威胁，斯大林认为重要的是要在将来改变新疆的民族-族群结构。他对中共中央建议说：“新疆的汉族人口现在不超过5%，在占领新疆之后，为全面开发这个广袤而又富饶的地区并加强中国边防，应通过汉族移民将汉族人口的比例提高到30%。总之，为加强中国国防，应让所有边境地区都住满汉人”。与此同时，他不同意中方代表团成员的意见，代表团认为暂缓占领新疆是由于穆斯林将军马步芳率领的国民党军队在西北地区。对此，斯大林说：“你们高估了马步芳的力量，他的骑兵是可以很容易被炮火消灭的。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给贵方提供40架战斗机，它们可以迅速打垮、驱散这些骑兵”。



刘少奇居留莫斯科之时，他以代表团名义起草了一份名为“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及苏中关系”的长篇报告，并于7月4日将报告交给了斯大林。报告阐述了中方在许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中方对斯大林有关新疆建议的态度。这位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写道：“我们是想尽快地解放新疆，但清除通向新疆道路上的敌人、确保运输畅通对我们来说是一大困难。必要的交通工具不足也是一个大难题……。如果我们能克服这些困难，那就可以使解放新疆的时间大大提前”。在莫斯科双方谈判期间，斯大林建议中国共产党紧急派遣一位代表前往新疆与伊宁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及新疆进步知识分子建立联系。他认为应当从一开始就让这位代表留在新疆监控局势。刘少奇说，这样的代表可以由代表团成员邓力群去担任，但指出需要和毛泽东协商该问题。谈判过程中，斯大林与中方代表团商定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中就包括邀请东突厥斯坦民族解放运动代表团参加1949年9月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代表大会。此外，双方约定处于苏联控制之下的北部三区左翼势力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合并，中方同意将三区民族军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1949年夏，在莫斯科与以中共中央书记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谈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争议问题。为解决问题，刘少奇向毛泽东做了汇报。7月25日，毛泽东就这些问题给代表团发来一封电报，并要求将电文内容告知斯大林。他在这封电报写道：“我们同意派邓力群到新疆，任务是在那里建立起与北平的无线电联系”。无论什么情况，毛泽东认为他的部队最早赶在1950年1-2月份前占领新疆是最为现实的。7月29日，苏联政治局根据刘少奇建议，通过了在伊宁设置为中国国民党代表处服务的无线电台并调派一架专机运送新疆代表团赴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秘密决定。决定中说：“满足中方代表团领导人刘少奇有关新疆问题的请求。为此：(a) 责成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及苏联外交部情报委员会（费多托夫同志）在伊宁设置一个专用无线电台，为电台配备必要的技术设备及提供操作人员，并根据刘少奇同志的请求，从在莫斯科为中方代表团服务的人员之中派遣1位负责人、2名无线电话务员、1名译电员及1名翻译用于伊宁无线电台的运行；(b) 责成苏联民用航空总局（贝杜科夫同志）调派一架专机将新疆民主地区代表送到赤塔，以便他们接下来前往北平”。政治局委托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维辛斯基以及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主席瓦冈·格里高利扬负责执行该决定

苏联和中共领导人都关注伊宁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负责人参加将于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情况。为此，他们发去了一封由毛泽东签名的邀请函。此时的毛泽东称新疆三区革命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北平也因此邀请了东突厥斯坦共和国的代表。像政治局那样重要的苏联机关甚至还决定调派一架专机送他们飞往北平。该代表团成员包括阿合买提江·哈斯木、伊斯哈克别克·穆努诺夫、阿不都克里木·阿巴索夫、达列里汗·苏古尔巴耶夫、乌鲁木齐中苏友好协会负责人罗志这些知名人士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知道，这些人此时还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持动摇和观望态度。政治局秘密决定规定“……将新疆民主地区代表送到赤塔，以便他们接下来前往北平”，大家知道，代表团于8月22日从伊宁抵达阿拉木图，再从那里飞往北京。然而，运送代表团前往中国的飞机8月25日却在伊犁库茨克地区遭遇令人费解的事故，机上所有17位乘客全部遇难。

中国新华社当天就对此事做了报道。虽然苏联驻伊宁领事向“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领导人之一的赛福鼎·艾则孜不断通报代表团从阿拉木图到新西伯利亚、再从那里到伊犁库茨克的飞行路线，但从伊犁库茨克起飞后有关代表团命运的情况他却什么都没有说。到了9月3日，他才将艾则孜叫到自己那里，向他宣读了从莫斯科收到的一封急电。电报称：“载有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所率代表团的飞机从伊犁库茨克起飞后不久，由于恶劣天气，很快在后贝加尔斯克山区不幸撞山坠毁；机上17人全部遇难”。曾任省政府秘书长的艾沙·优素福·阿尔普特金认为，这起事件的发生是因为莫斯科需要将与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有关的“苏联痕迹清除掉”。在他看来：



“中国共产党人不知道俄国人与反对中国共产党及中国国民党的伊犁起义者之间所达成的那些协议情况”，因此出现了谋杀这样的结果。伊宁按莫斯科指示很快就组建了一个新的代表团前往北平。9月8日，由赛福鼎·艾则孜、阿里木江、涂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启程赴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大会。

1949年夏，新疆境内再次紧张起来。在斯大林的坚持下，占领新疆已被中国共产党纳入其近期计划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这一天，陶峙岳将军来到酒泉，邀请人民解放军进入新疆。10月13日，东突厥斯坦城市哈密被共产党军队占领。在这些天，为了占领新疆首府，新政府主席毛泽东紧急致电斯大林，请求派遣飞机使其能够调运一个师到乌鲁木齐。10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满足毛泽东同志请求的决议。在给中国领导人的回电中讲道：“我们认为您使用飞机从酒泉调派一个师到乌鲁木齐的决定是正确的。关于您请求运送1000吨航空汽油到乌鲁木齐以及其中200吨到哈密，现通知如下：我们可以用汽车把这些燃油于11月1-3日间运到乌鲁木齐和哈密。我们需要知道您的看法：我方载燃油车队在从伊宁经乌鲁木齐到哈密这一路线上能否畅通无阻。用于加强乌鲁木齐和哈密机场服务的人员以及您在自己电报中请求的、五架由彭德怀同志支配的备用运输机，我们将按您指定的时间如期提供到位”。双方通过这些电报交流一周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就进入了乌鲁木齐。新疆其余那些大城市于较短时间之内也纷纷移交到解放军手中。在革命胜利之后，毛泽东亲自邀请张治中将军担任领导之职。1949年12月17日，新疆成立了新的省政府以及新疆军区，包尔汉再次被任命为政府主席，而北部三专区作为分离的区域单位则被撤销。分布在这些地区的民族军部队被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军。12月28日，回到北京的彭德怀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关于新疆情况的详细报告。

就这样，在共产主义革命在中国获得胜利之后，新疆的“苏联篇章”也走到了尽头。对于新疆北部地区1944年11月那些革命事件的秘密，莫斯科选择了向世人、其中也包括中国共产党保密。这些事件的积极参与者也因伊尔库茨克城外的空难而被清除。苏联最终将曾被用作向蒋介石政府施压工具的新疆北部三专区以及整个新疆省交给了北京政府。新疆历史新的一页也从而开始。1955年，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成立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该地区的这个身份一直沿用到现在。

【报刊文章】

印度取消印地语强制教学

《环球时报》2019年6月4日第4版

《环球时报》驻印度特派记者 苑基荣

“这就是在给印地语开后门！”印度德拉维达进步联盟党一名议员指责印度中央政府上月31日发布的2019年国家教育政策时说。据《印度教徒报》3日报道，该政策规定，印度非印地语地区的课程体系必须包含当地语言、英语和印地语，而印地语地区除了印地语和英语外，须再加一种现代印度人的语言。但该法案在非印地语地区遭到强力反对。无奈之下，印度中央政府将该规定改为“这3种语言中至少一种达到可读写程度”。



印度总理莫迪 2014 年上台以来就打出民族主义旗号，提出“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全国推行印地语教学，希望将印地语作为全国通行语言。但是，被联合国誉为“语言博物馆”的印度其语言种类非常丰富，打开印度货币卢比，上面印着的官方语言有 18 种，而实际情况远比这多。根据印度建国初期的统计，印度共有 1652 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百万的达 33 种。那时，印度宪法规定可以根据语言建邦，即只要说一种语言的族群经过公投后达到一定标准就可以建立一个邦，这是各地方语言逐渐被强化的原因，更是各地反对印地语教学的根源。虽然印地语是宪法规定的印度官方语言，但真正能说印地语的人只占印度人口的 40% 左右。这种情况下，印度政府把英语暂定为官方语言。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3 日报道，1965 年印度南部的泰米尔纳德邦就曾因为印地语被定为官方语言发生暴力抗议事件。该邦所用的泰米尔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当地人都以此自豪。此次，强制印地语教学的政策在泰米尔纳德邦再度引发强烈反抗。该邦两个主要政党表示，仅修改政策还不够，当地学校只愿意教授两种语言——泰米尔语和英语，根本不想引入第三种语言。为了平息抗议，印度财政部长西塔拉曼和外交部长苏杰生用英语和泰米尔语发推特，保证不会强制任何语言，并保证进一步与公众和各邦磋商。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公众号，欢迎加入并转发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 1 期-第 281 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

